

一個創作的起點： 郭松棻七〇－八〇年代的政治 思想轉折與文藝觀念演變*

鍾秩維**

〔摘要〕

郭松棻是臺灣現代主義的先鋒人物，同時也在保釣運動中展現大將風采。在 1970 年代的十年間，郭松棻曾撰寫為數不少的政論與文論，而伴隨這一批材料的，毋寧是郭出入保釣的曲折歷程。在此十年間，郭松棻的意見說法時常出現對同一人物、現象前後看法不相一致的現象：亦即在重複的律動中時有偏離。為求釐清郭氏重複律動的歷史軌跡與心理動因，本文建立一個左翼／臺灣憂鬱的論述框架，一方面脈絡化郭松棻政治／思想的發展，另一方面概念化其人文藝評論的理念：在前者，我們注意的是在全球左翼的語境中定位郭松棻的言說；在後者，郭如何介入臺灣現代派與鄉土派的美學爭執將成為焦點。整體而言，本文期待為郭松棻的「後保釣」擘畫更開闊的地圖與視野，並循線追索臺灣現代派美學的政治縱深。

關鍵詞：郭松棻、後保釣、左翼憂鬱、臺灣憂鬱、現代派、鄉土派

* 感謝審查人與編委會惠賜修改建議。本文的最初版本曾在「生命的印記：文學家與他們的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 年 3 月 24 日-25 日）發表，感謝楊雅儒教授的講評點撥。初稿同時承蒙王德威、陳柏旭與潘怡帆諸位師友的不吝指正，特此申謝。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重複與偏離：郭松棻文業的律動

大抵說來，臺灣現代文學主流所呈現的面貌是：

- (1)在意識形態方面：就縱的來說，與民族的大傳統割絕，從橫的來說，向西方攀附套取不遺餘力；
- (2)在生活態度上，不是樂觀進取，前瞻外鏢，而是悲觀頹廢，回顧內縮；
- (3)就作家的背景來說：兩種作家主持當前臺灣文壇的風會：一種是軍中作家，很受僵化的反共思想的薰染；另一種是學院作家，一個個成為西方各種思潮的在臺總代理；
- (4)就創作的趨向而言，大多迷執於形式的多方變化，而忽視題材、主題與大現實的脫節。

1974 年正月，一篇劍指臺灣現代文學的檄文在香港《抖擻》雜誌的創刊號上揭竿起義。此文題為〈談談臺灣的文學〉，作者是羅隆邁。¹羅氏擬出上述四點作為現代派罪狀，而這些批評大致可區分成兩個層次：首先在意識形態上唯西方馬首是瞻，不顧，甚至不屑，民族現實的處境狀況，並挾反共旗幟敵體化社會主義革命；而由此世界觀衍生而來的，即是風格上的內向疏離，侷限於騰挪形式的表面工夫，無視，並且無能，回應外在世界變化的趨勢。〈談談臺灣的文學〉更明確指出罪魁禍首：受到僵化反共思想箝制的軍中作家，以及甘為西方文化掮客的學院中人；前者以《現代詩》、《創世紀》等詩社的機關刊物為據點（代表人物為洛夫〔1928-2018〕、痖弦〔1932-〕），後者據臺大文學院《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刊物為窩巢（王文興〔1939-2023〕不啻其中病人膏肓的一位）。²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指認，〈談談臺灣的文學〉所責難的「現代文學」，其實是臺灣現代派的創作。³

¹ 本文採用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9 年）的版本，見頁 28-43。

² 同前註，頁 36、40。

³ 「現代主義」(modernism) 在六、七〇年代似乎還不是一個有如今天般通用的詞彙。在臺灣的語境中，比如夏濟安、葉維廉在當時都稱後來被冠以現代主義小說的作品為「現代小說」。夏濟安：〈評〈落月〉兼論現代小說〉，《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1971 年），頁 34-63；葉

然而弔詭的是，這位對現代派不假一絲辭色的羅隆邁，八〇年代後竟蛻變成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最為極致的實踐者。羅隆邁不是別人，正是長年離散在美的作家郭松棻（1938-2005）。〈談談臺灣的文學〉言詞鏗鏘尖銳，議論站穩反帝反殖的立場，充分顯示七〇年代初期投入保釣左翼行動的郭松棻，其人其時文體特徵與價值訴求。而在發表〈談談臺灣的文學〉之後的二月與三月，郭松棻陸續還發表了〈戰後臺灣的改良派〉，此文犀利批判雷震（1897-1979）與殷海光（1919-1969）者流自由主義言說空泛的不切實際；⁴以及郭氏綜論「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的系列著作的第一篇：〈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⁵在這篇文章裡，郭松棻同樣嚴厲地針砭了以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中，不願如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也如郭本人一般與時俱進，走向革命的保守反動份子。雖然一是針對臺灣政局的政論文章，一是處理西方哲學史的學術論文，此二篇章其實同質異構，所著眼的均為揭露冷戰自由人文主義（Cold War liberalism/humanism）包藏殖民野心的偽善不實。⁶

其實在稍早的〈談談臺灣的文學〉中，郭松棻開門見山就直擊「文學與殖民主義」的話題，⁷並且已經拿卡繆來祭旗。郭視《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1942）為西方文化消費「委託行」最熱門的商品。郭氏痛陳卡繆的麻木不仁，其人「體驗了戰後西方之頹唐荒謬的生活猶不想擺脫求變，反而還想出一種神話，給予虛無的生活以理論的基礎，西方精神之破產到此已經無以復加。」⁸進

維廉：〈現代中國小說的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的風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頁19-50；夏文發表於1956年，葉文則出版於1967年。

⁴ 郭松棻保釣時期的政論文章基本上都發表在海外刊物上。本文引用的版本皆出自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2014年）；郭松棻：〈戰後臺灣的改良派〉，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頁305-317。

⁵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的系列文章基本上都以羅安達為筆名，發表於《抖擻》。本文引用的版本皆出自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哲學卷》（新北：印刻，2014年）；見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一）〉，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107-124。

⁶ 臺灣文學生產與冷戰自由人文主義的糾纏，可參考王智明的深度剖析。王智明：《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新北：聯經，2021年）。

⁷ 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28。

⁸ 同前註，頁34。

而痛批不明（或裝作看不見）卡繆為殖民主義粉飾太平底細的臺灣現代派：⁹「偷取西方書架上的感情，拿對方的虛無來附會自己的苦悶，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其結果無濟於事不算，更糟糕的是尚且「混淆了臺灣現實的真相」。¹⁰所謂真相也者，當屬被西方——尤指美國及其區域代言人日本——殖民的事實。郭松棻以「精神致勝法」來定調卡繆及其薛西弗斯，¹¹考慮到精神致勝法是一般對於魯迅（1881-1936）所創造的經典中國人形象阿 Q 的評價，郭松棻此處的詮釋毋寧顯示他的關心仍舊是致使「民族」欲振乏力的精神上的「病」。這是郭松棻保釣時期書寫的主旋律，而他在不久前才以〈阿 Q 與革命〉（1971）大肆挖苦海外華人無中心思想，端賴精神致勝的諸多洋相。¹²

不過同樣弔詭的是，在「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後續的發展中，郭松棻明顯調降他對於卡繆思想的不滿力道；郭氏改採一種相對持平的語調作為替代，這也使得文章的風格轉變為導讀式的歸納講述。然而若欲閱讀此一系列的第二篇文章，需要等到三年後的 1977 年。〈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二）〉仍舊在梳理卡、沙二氏的爭執分合，¹³但是郭松棻這篇沉潛許久的續作並未承接 1974 年的討論，他硬生生地從頭來過，重新回到卡繆因《反抗者》引來沙特派圍剿的起點娓娓道來。由此決絕之舉當可察覺，郭松棻在看待現代政治／思想的立場態度上出現了某種轉折；此一轉折無疑非常激烈，因它竟驅使郭松棻非將整個寫作計畫打掉重練不可：不透過重來彷彿就無法重啟論述。

類似的突兀轉折同時發生在郭松棻有關臺灣文學的分析之上。〈談談臺灣的文學〉貶抑現代主義，揚舉鄉土文學，特別是「以大篇幅綜攝歷史的進展，凸出民族的顛沛和個人的悲歡」的吳濁流（1900-1976）和鍾肇政（1925-2020）；¹⁴儘

⁹ 具體來說即卡繆為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背書；抽象來看則卡繆的論述與西方殖民話語的同質異構。郭松棻在〈談談臺灣的文學〉已對卡繆不假以辭色，而更尖銳的批判見如〈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一）〉。

¹⁰ 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 35。

¹¹ 同前註。

¹² 〈阿 Q 與革命〉以筆名鐵曇，發表於香港期刊《盤古》1971 年第 36 期，頁 32-33。與此相似的冷嘲熱諷也見於稍早（1970 年）發表的〈秋雨〉。

¹³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一）〉，《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 107-124。

¹⁴ 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

管郭氏亦提到，在藝術表現上，這些作家「離完美的境地還有相當的距離」。¹⁵而導致這一落差的根本原因，恰恰由於在陳映真（1937-2016）與黃春明（1935-）登上文壇舞臺之前的鄉土派，普遍欠缺形式的自覺。¹⁶如此一來，我們當不至於對郭之評述後來的轉折感到太過驚訝：在生命暮年接受訪問時，郭松棻坦言鄉土作家的見解大抵皆難以一窺文學的堂奧；¹⁷與此相對地，他重新納入七〇年代時被自己斥責為西方附庸的同學王文興為同路人——郭、王在臺大外文系同班，也都參與初期《現代文學》的活動——認為彼此在看待文學的態度上更為契合。¹⁸不過更為郭松棻引為知音莫逆的，則是「一個小說反反覆覆修改，寫了一、二十年」的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¹⁹這位居於西方文學由寫實主義轉向現代主義臨界點上的法國文豪。而有趣的是，即使〈談談臺灣的文學〉通篇以斥責現代派昧於現實來立論，但總結出「悲觀頹廢」的消極性（passivity），與「回顧內縮」的內向性（introspectiveness），乃至從由「形式的多方變化」塑造語言的反身指涉（reflexivity）等美學特徵，卻也切中現代主義信念的核心，²⁰不可不謂知言。

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 39。

¹⁵ 同前註。

¹⁶ 同前註。張誦聖指出，現代派與鄉土派的區別與其說是在文學形式上採取差異的態度，不如說是雙方對於「文學何為」的實效功能認知不同。張的說法不失為對郭松棻何以在八〇年代後一蛻而變為激進的現代主義者此一問題的一種解釋，不過本文認為，既然兩派齟齬的是攸關「文學何為」的信念問題，那麼一個精神史的考察（也就是本文的路徑）興許更為切中核心。張誦聖的說法見氏著：《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頁 13-19。

¹⁷ 郭松棻如此表示：「當時（按，寫作〈談談臺灣的文學〉時）覺得鄉土意識強的作家好……但幾年後慢慢改變看法，鄉土作家們的所謂反映時代、土地與人民的三部曲性的作品其實都沒法進入文學堂奧的。」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誰為何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23 期（2005 年 7 月），頁 53-54。

¹⁸ 在高高揚舉七等生（1939-2020）的成就後，郭松棻接著表示：「和我同時的王文興也很好，〈欠缺〉是一篇成功的短篇，長篇《家變》、《背海的人》我還有待時日才能消化。」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誰為何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頁 54。郭松棻在另一個場合提到，《現代文學》創刊號以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製作專輯很可能來自於他給王文興的靈感；此外他也曾幫忙白先勇（1937-）找尋願意印發《現代文學》的出版社。簡義明訪問、整理：〈郭松棻訪談錄〉，收入郭松棻：《驚婚》，（新北：印刻，2012 年）頁 192-193。

¹⁹ 簡義明訪問、整理：〈郭松棻訪談錄〉，收入郭松棻：《驚婚》，頁 209。

²⁰ 消極性等語彙為本文對郭松棻評述的歸納定調。若再進一步對照散見於文中的郭松棻有關現代主義的敘述，將更確定他對此一美學流派的特徵具備實質的掌握，見郭松棻：〈談談臺灣的

在上述郭松棻的故事中，不難注意到現代派、鄉土派、自由、革命、殖民與民族等詞彙不斷地重複；有時甚至體現為同一論題重新來過的激進形式，例如兩篇在卡繆和沙特論戰原點下錨的文章。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郭松棻對同一對象、同一論題的意見時常變化反覆；也就是說，在重複的律動中，郭的闡釋往往偏離原來的彈道軌跡。而這一重複（repetition）與偏離（deviation）現象的發生，歸根究柢，實與 1974 年下半年，郭松棻的一次旅程息息相關：在發表〈談談臺灣的文學〉等三篇文章之後的七月份，保釣健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無限憧憬的郭松棻，終於踏上許諾著革命願景的中國大陸（同行的還有其父郭雪湖〔1908-2012〕，與其妻李渝〔1944-2014〕）；在此之前的 1972 年，為了支援共產中國在聯合國的工作，郭松棻和劉大任（1939-）等西岸同志紛紛放棄博士班學業，從舊金山移居紐約，在聯擔任中共的翻譯官。任誰都沒想到這趟得來不易的大陸旅行竟反倒徹底扭轉郭松棻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想像。實地見證文化大革命（中國革命的極端演變）摧枯拉朽後社會與民生的凋敝，人倫和文明的浩劫，郭松棻所面對的不僅是紅色烏托邦的灰飛煙滅，一己注入滿腔熱血的信念結果係如此不堪聞問，兇猛的反撲除了促使其人淡出保釣，更為郭帶來嚴重的精神崩潰危機。

李渝曾經自白，在帶著失落退出保釣之後與重新執筆創作小說之前的這一段茫茫然過渡期，自己回到藝術史的學業試圖返回初衷，郭松棻則埋首哲學史研究以期為革命何以導致極權找到解答。²¹「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即郭氏求索的軌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大可將郭松棻的重複與偏離理解為一種左翼憂鬱（left-wing melancholia）徵候群。對於同一主題近乎偏執狂般的重述（重複），然而所表現的情意卻顯示為搖擺不定的莫衷一是（偏離），此可謂憂鬱書寫的顯著徵象，也充分體現在郭松棻的寫作之中。重複發生的事件，反覆出現的場景彷彿歷史的噩夢，蟄居在郭松棻認同危機——特別是由左傾連鎖而出的生涯劇變——的核心。循此脈絡，我們應可進一步將重複（及其價值判斷的反覆，亦即偏離）放在更整體性的作家作品語境中考察，並將它視為郭松棻的主體拓樸在歷史境遇與政治抉擇中面臨斷裂的徵狀。

在此需要提出來說明的是，郭松棻文業中的重複與偏離並非嶄新議題，前行

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 38-39。

²¹ 李渝：〈射雕回看〉，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頁 403。

研究對此其實已著墨不少：首先，以重複作為一種書寫風格來說，潘怡帆聚焦郭氏文學的重寫現象（如〈寫作〉和〈論寫作〉的關係），藉以繪測當重複律動逸出常軌那一刻的創造性；²²再者，以偏離作為一種面對歷史劇變的姿態而言，黃錦樹與劉淑貞意圖從郭松棻的小說中鉤沉小說家（無法）與現實抗衡的美學的革命藍圖。²³而不論是前者或後者，批評家的目光大多圍繞郭松棻八〇年代重返文壇的小說作品，與此同時，他（她）們也無不直接或間接地挪用郭松棻輾轉在太平洋兩岸的美學／政治洄游，作為解釋其人重複與偏離運動的參照系統。相較於此，本文鎖定郭松棻七〇到八〇年代之間的「雜文」著作為觀察對象，包括思想評述、文藝評論、政論文章，乃至於翻譯著作；換句話說，此處的意圖毋寧更意欲重建郭松棻重新執筆創作之前的精神史演變。本文以「雜文」來涵蓋郭松棻七〇到八〇年之間非小說的寫作。這些文章大部分都不是抒發情性，表述自我的文類意義上的「散文」，而多半是分析性的評述文章。相較於郭松棻以晦澀為能事的小說，這一批資料更直接地顯示郭氏對於現實政治、對於歷史流變，以及對於身份認同的思索探討；理論上，也比虛構小說更貼近郭松棻本人的意見想法。換句話說，雜文材料實更有助於釐清作為知識人的郭松棻思維與心態的變化。²⁴

目前學界亦存在不少透過這一批材料來處理郭氏心境轉折的討論，不過既有成果若非援之作為導向郭松棻八〇年代以還小說的前情提要，就是以描述的筆調交代此些文章的前因後果。²⁵換句話說，更加後設性的思想／史分析仍有所欠缺：此即以下嘗試展開的工作。而左翼憂鬱將是本文藉以概念化郭松棻重複偏執的主要術語。同樣地，郭松棻左統信念的是虛是實，他對臺灣（甚或臺獨）的態度伊

²² 潘怡帆：〈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中山人文學報》第42期（2017年1月），頁29-46；潘怡帆：〈缺席及錯置的作品：從郭松棻的〈寫作〉到〈論寫作〉〉，《政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18年12月），頁249-279。

²³ 黃錦樹：〈窗、框與他方：論郭松棻的域外寫作〉，《論嘗試文》（臺北：麥田，2016年），頁228-254；劉淑貞：〈論寫作，以及它的匱缺：論郭松棻的小說〉，《中山人文學報》第44期（2018年1月），頁33-54。

²⁴ 「雜文」的說法在中國歷代文論中都有記載，所指大抵那些無法被歸於任何既成文類的「其他」。在現代文學中，雜文尤其涉及一種為現實所驅動的「力的」文章。現代雜文的代表作家不是別人，正是魯迅。「力」的說法來自黃錦樹，他藉以區別雜文與以「美」為指標的抒情性散文。黃錦樹：〈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論嘗試文》，頁391-401。

²⁵ 顧正萍為一批著作提供了非常詳盡的梳理，見顧正萍：〈郭松棻的政治思／理想試探〉，《從介入境遇到自我解放：郭松棻再探》（臺北：秀威，2012年），頁55-108。

於胡底，這些攸關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區辨釐析也一向引起研究者的興趣。²⁶然而有別於認同政治取徑非此即彼的二元劃分，本文的論證將指出，郭松棻的左翼憂鬱和他訴諸臺灣身份的漫長思索——從保釣時期析論何為／何以臺獨的政論，到小說時空總設定於臺灣歸屬混沌未明的戰後初期——互為表裡，難以區分。如此一來，在郭松棻的範例上，左翼的憂鬱即為臺灣的憂鬱，²⁷其中涉及的弔詭，甚或矛盾的動態力場，尚待非二元的深描，更後設式的解析，始有顯現的空間。也唯有如此，郭松棻的跨太平洋闡連（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在文學／美學、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多重意義，也才有實現的可能。

最後，本文援用重複與差異作為勘查郭松棻七〇至八〇年代文業狀況的探照燈，在方法學的層次上：重複與差異一方面乃是當代法國哲學的重要命題，對於重複的關注折射出思想家攸關起源與創造（亦即差異）等等涉及「書寫／本體」的反思辯難；另一方面，重複與差異也是目前建構抒情（詩）理論的議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維度：重複是抒情文體核心的特徵，但批評家也留意到，每一字面上的複查招喚的實為不同的情境效果。而無論前者的在哲理上重新評估書寫的（不）可能性，亦或後者的以試圖透過抒情的發聲來喚醒歷史的神靈或幽靈，二者皆屬郭松棻文學著力甚深的項目。²⁸不過，儘管充分意識到重複與差異論題在理論上的發展，但本文的用心將更放在歷史化郭松棻文業中重複／差異現象的工作上，並尤其著重將它置於全球與本土左翼語境中交叉比對的脈絡解析。之所以選擇此一路徑毋寧是考量到，在既有的郭松棻研究中，一個較為完整而全面的史實描繪，以及兼具後設評述的歷史分析，仍屬欠缺。

以下即以郭松棻發表於七〇與八〇年代間的政治思想寫作，以及文藝評論實

²⁶ 譬如魏偉莉：〈創傷與重生：從早期作品論郭松棻創作基調的形成〉，《臺灣文學研究》第 1 期（2007 年 4 月），頁 33-71；張俐璇：〈雙面「一九八三」：試論陳映真與郭松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5 期（2017 年 10 月），頁 219-249。魏文將郭松棻作品置於八〇政治文學的語境中解讀，撰述的旨趣無非論證郭怎麼（重新）承認「臺灣人」的身份；張文則在比較陳映真與郭松棻如何在差異的（美學／政治）意識型態間，「從 A 到 B」的正反辯證。

²⁷ 「臺灣的憂鬱」一詞來自施淑：〈臺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藝術〉，《兩岸文學論集（一）：文學星圖》（臺北：人間，2012 年），頁 181-195。詳細的分析見下文。

²⁸ 見如潘怡帆：〈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缺席及錯置的作品：從郭松棻的〈寫作〉到〈論寫作〉〉；黃錦樹：〈窗、框與他方：論郭松棻的域外寫作〉。

踐為討論對象；這一批材料顯示出郭松棻在重回小說航道之前，所做的種種調整調度。這一趟航程大體可區分為三個階段：（1）回到列寧；（2）回不去的「中國」；（3）重返臺灣／文學。而有鑒於若要後設性地分析文獻，言說語境的建立和思維內涵的分析同樣關鍵，因此，一方面，在歷史框架上，我們同時援用國際左翼運動／思潮，以及臺灣文學史的演變發展作為郭氏文章的參照系統；另一方面，亦將借助左翼憂鬱與臺灣憂鬱的雙重理論視角，以求透視此時郭松棻書寫／位置的複雜轉折。

循此，本文期待為郭松棻「後保釣」的政治思想與文藝觀念擘畫更開闊的地圖與視野，並循線追索臺灣現代派美學的政治縱深。相較於編年史式的本事繫年，這裡所謂的「後保釣」並不完全指涉某個明確的時間段，而是如同「後殖民」或「後遺民」，所言者乃是一種與所接續的事件——「保釣」——交纏或交鋒，對話或對抗的錯綜狀態。換句話說，「後保釣」雖然存在可以實際對應到的現實經驗（譬如郭松棻淡出保釣據信是在 1974 年訪中以後），但是它更企圖凸顯「保釣」在個體（或特定世代）其後的精神史、文學創作等各方面上殘留的痕跡。²⁹

二、憂鬱的旅程

如果說重複與偏離是郭松棻文業的慣性運動，那麼這套運作模式的關鍵轉折幾乎隨著後保釣（1974 年訪中後）的開啟而同步轉動。以下將鎖定七〇年代中葉後郭松棻幾個重要的「重返」回顧，藉以檢視其人重複運動背後的歷史語境與心理動機。

（一）回到列寧³⁰

²⁹ 晚近劉淑貞亦提出類似本文後保釣的視野，見劉淑貞：〈鬱的演化：從藝術批評到小說書寫——論李渝保釣後的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第 37 期（2020 年 6 月），頁 127-150。

³⁰ 有別於前行研究一般認為的，在「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佔據關鍵位置的是郭松棻對於沙特、卡繆前後不一的評價，本小節意圖指出，郭氏真正的用心恐怕更是圍繞列寧的闡述。事實上，在這一系列文章中，至少從知識面來看，郭松棻對沙特又或卡繆的理解並無明顯改變；有所差異的是他的情感面（或謂人生閱歷）產生了變化。而釀成此一劇變的無非是七四年訪中後，郭對革命的困惑。郭的沙、卡讀解見鍾秩維：〈殷師的池塘：郭松棻的〈秋雨〉及其七〇年代的政治與思想轉折〉，《清華學報》第 52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頁 742、756。

總之，共產黨人，不分民族國界，都支持每一個對抗現存社會和政治體制的革命運動。

在所有革命運動中，它們皆明白指出財產權是問題的根本所在，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如何。

最終，共產黨人，不分民族國界，努力爭取和世界各國所有民主政黨的團結與協調。

共產黨人不屑隱瞞自己的觀點和目標，他們公開宣示，唯有暴力消滅所有現存的社會狀態，他們的目標才可能達成。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前驚悚顫抖吧。除了枷鎖，無產階級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他們贏到的將是一整個世界。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吧！³¹

1848 年 2 月，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公告〈共產黨宣言〉，全文由清晰的條理，雄辯的修辭，與渴望改變的熱情編織而成，堪稱政治與文學最經典的現代交會。然而儘管馬克斯剴切陳詞，無產者革命在宣言發布後的歐洲卻是節節敗退：1848 年由法國發軔的席捲歐陸的革命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到幾年之間一一被撲滅，而在德國與義大利接連完成統一大業後，民族國家作為歐陸政治基本單位的格局基本已無可撼動。當民族主義逐步紮穩它的根基，資本主義亦在茁壯的過程中慢慢調整體系內的各種矛盾，包括改善勞工的待遇：「英國工人並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期的那樣，奮起革命，要求自己的政權……馬克思以後的社會發展更證實了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已經過時」、「無產階級沒有遵照馬克思的預言發展。歷史證實了馬克思晚年的憂慮：改革和工會的成立大大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更使工人隊伍成為保守派的核心」。³²

上一段尾聲的兩則引文來自郭松棻，乃郭氏從卡繆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 1951，郭譯為《叛徒》）中延伸而出的有關馬克思理論的批判。卡繆因為發表《反抗者》一書而遭到沙特派的圍剿，圍繞在雙方正反爭執底下的論題攸關

³¹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斐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麥田編輯室譯，林宗弘審訂：《共產黨宣言》（臺北：麥田，2014 年），頁 102-103。強調為原文所有。

³²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二）〉，頁 133、134。

社會主義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治下的蘇聯發展的狀況：卡繆嚴詞批判蘇共的倒行逆施，但他的普世人道的立場與奠定於此的馬克思哲學詮釋，皆觸怒當時以左翼是尚的法國知識圈。然而伴隨史達林政權在治理上的偽造宣傳，在打擊政敵上的專橫暴虐等等劣跡於五〇年代陸續公開，卡繆「反動」的批評反而成了先見之明的超前；但法國左派並未因此放棄革命的初衷，沙特派對卡繆思維昧於現實（因而偽善）層面的解析確實鏗鏘有力。糾纏在卡繆與沙特論戰之中的，用郭松棻的話來說，毋寧屬於「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的命題；而卡繆所代表的保守的自由派立場，與沙特所捍衛的左派行動路線，即為箇中最強勁的兩股張力。郭松棻在 1974 年訪中前夕發表了他這一系列研究的頭一篇論文，當時他明顯比較響應沙特派的聲腔，對卡繆絲毫不假以辭色。但是在 1977 年，他從頭重新開啟討論，此次採用的卻是描述性的筆調，僅僅摘要正反雙方論旨的要點。

此一轉變毋寧和郭松棻的中國行密切相關，毛澤東治下共產中國荒蕪蕭條給予他極大的打擊。換句話說，七〇年代中葉的郭松棻畢竟經歷了西方左翼在五〇年代中葉所面臨的信仰危機；而郭松棻畢竟不同於他的西方左翼同胞般，能在毛主席上覓得寄託，³³相反地，郭反倒回返「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的現場：在這個意義上，此一系列書寫毋寧銘刻著一名東方左翼知識人在後保釣廢墟中重詮信念的精神史軌跡。而位置在郭思想史論述核心地帶的，與其說是卡繆與沙特的孰是孰非（此為現行研究的核心關切），³⁴不如說是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如何成功地在（如同中國般）不具雄厚工業基礎與資本實力的俄國，因勢利導地實踐，終於因地制宜地實現共產政權。

發達的工業與龐大的資本為馬克思認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發生的前提，因此列寧式革命究竟是英雄或者廢品，歷來眾說紛紜。也就是說，有別於在「卡繆 vs 沙特」的分析上大體只剩下歸納性的陳述——這部分在結構上的目的與其說是

³³ 西方左翼如何藉由中國革命來重振旗鼓，乃至於更新自己的思想視野，是個極端複雜的問題，超出此處能討論的範圍。晚近史書美提出了一個深具批判力道的視角，她藉以反思以沙特為代表的西方左翼，如何例外化中國問題，Shu-mei Shih, "Is the Post- in Postsocialism the Post- in Posthumanism?" *Social Text*, vol.30, no.1 (Spring 2012), pp.27-50.

³⁴ 圍繞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系列論著已經累積若干重要解讀，其中顧正萍〈郭松棻的政治思／理想試探〉一文的摘要最為詳實，但她似乎還未能對這批材料做更後設的分析。在這個意義上，黃錦樹為郭氏文章所擘畫的學術史的視野深具參考價值。見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2004 年），頁 249-288。

主幹，不如說是為了推導出核心論題的鋪陳——郭松棻真正關切的，不啻列寧如何實現革命的前因後果。此一判斷可以在 1983 年的一篇訪談稿中找到傳記性的佐證：在名為〈長期鑽研理論的郭松棻〉的這筆資料中，郭松棻現身說法，表示在自己八〇年代埋首馬克思理論的求索過程中，區辨「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進而認清列寧主義的本質，乃是首要的功課。³⁵藉此郭試著為馬克思理論如何實踐尋找答案，並同時思考許諾解放的革命何以竟招致史達林主義的極權統治。在這個問題上李渝不愧是郭松棻的知音，在《行動中的藝術家》的序文中，她率先以象徵性的方式揭示了〈行動中的列寧主義〉在「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寫作中的位居要衝；³⁶另一方面，回到列寧事實上也在西歐共產黨對史達林的檢討聲浪中佔據一個主要的位置，包括被斥為異端的托洛斯基主義（Trotskyism）都捲土重來。³⁷

儘管回到列寧固然出自革命理論家對於史達林主義的不滿暨挑戰，不過這條反思之路所依循的仍是較為正統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它和六〇年代以還，尤以法國為中心，醞釀生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正統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分道揚鑣事涉全球左翼運動的路線抉擇，甚或世代鬥爭，箇中纏結的對話或對抗超出此處能處理的範圍。這裡想要指出的是，即使郭松棻借徑回到列寧來反思保釣革命的來時路，但是如同黃錦樹指出的，後來當郭氏重返文壇時，他的憂鬱氣質倒是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理論資源的重要巨擘：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更為相通。³⁸這種顛倒不啻郭松棻偏離姿態的另一例證。無論如何，奠定在此基礎之上，本文將另外參照左翼憂鬱——事實上，班雅明其人其說一直給予此派學說重要的養分——的理論（詳後），藉以進一步探勘郭松棻政治思想與文藝觀念的轉折。

言歸正傳：列寧（主義）在郭松棻系列論文中的登場在〈談卡繆和沙特的思

³⁵ 李怡訪談、整理：〈長期鑽研理論的郭松棻〉，《知識份子與中國》（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83 年），頁 189。

³⁶ 李渝：〈抒情時刻〉，《行動中的藝術家：美術文集》，（台北：藝術家，2009 年），頁 6。

³⁷ 史達林（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勢如水火的關係事涉複雜，後者如何被前者形塑為「惡魔」的形象，竟至以魔鬼的他性干擾前者的議程，見 Robert H. McNeal, "Demonology: The Orthodox Communist Image of Trotsky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Winter, 1976/ 1977, vol. 32, no. 1, *Communism* (Winter, 1976/ 1977), pp. 20-40.

³⁸ 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頁 254-255。

想論戰（四）》，³⁹行文至此，郭松棻已非常仔細地闡明卡繆所揭露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無法自圓其說的窘境，其中最顯著者莫過於四〇至六〇年代間橫行的「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此一政治干預科學的醜聞充分顯示史達林體制反智與官僚的傾向，而違逆者一律面臨肅殺的鬥爭。⁴⁰郭松棻對李森科事件的前因後果做了脈絡式追索，關注的時間點超越五一年出版的《反抗者》，也越過卡繆的有生之年（1960），而直至1965年李森科的倒臺。最後，郭引用蘇聯《文學報》（*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對李森科主義的嘲諷來終結這串討論：「科學不接受任何信仰」。⁴¹郭松棻對李森科事件的執著一部分當然出自對於史達林主義的不以為然，但它卻也未嘗不是對同一時期毛主義超英趕美大躍進（乃至隨後展開的文化大革命）的指桑罵槐。莫忘記郭松棻重探戰後西方左右分合的動機即為七四年訪中後對中國革命深沉的失落感。

無論如何，口號治國，意識形態穿透與監控所有場域的悲劇促使郭松棻回到列寧發動革命的現場。郭松棻非常全面而詳盡地鋪陳列寧革命事業的背景：首先，綜覽歷史局勢，在俄國境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農業為主的貧窮社會原則上不具備革命的條件；在國境之外，一方面，革命行動在1848年之後的歐洲趨於疲軟，幾無再起的趨勢，另一方面，一次大戰更助長民族主義壁壘分明情緒的高漲。⁴²其次，在方法路線上。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如何解決俄國的困窘問題上相互競爭；而即便在社會主義內部，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主張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與孟什維克黨人「階段論」（指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分期）的看法，

³⁹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四）〉，《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153-173，這一章雖仍以卡繆與沙特為題，但討論實際上已經在鋪陳俄國革命的背景脈絡。

⁴⁰ 郭松棻有關「李森科事件」的報導見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三）〉，《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145-152。為求洞悉這一起事件的前因後果，郭松棻主要參考了 Zhores A. Medvedev, *The Rise and Fall of T.D. Lysenko*, trans. I. Michael Lerner.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⁴¹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談卡繆和沙特的思想論戰（三）〉，頁152。

⁴² 遑論多種族的俄羅斯帝國境內，也蟄伏著民族衝突的緊張，分離主義的威脅隨侍在側。郭松棻未及處理帝國內族群關係與革命的合縱連橫，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雷克斯·韋德（Rex A. Wade）著，謝家榮譯：〈第六章：民族——認同與機會〉，《共產元年1917：俄國革命與改寫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新北：遠足，2021年），頁207-240。

都對列寧（提倡先覺覺後覺的「意識論」）及布爾什維克的主張構成嚴峻挑戰。⁴³獨樹一幟的列寧主義就在這些夾擊中掙扎蛻變，邁向成熟成功。而所謂列寧主義大抵來說即：（1）由已萌發社會主義革命意識的知識份子帶動，這群以革命為職志的有志之士既是為工人而戰的先鋒部隊，也是負起啟蒙無產者階級意識的領導班子；（2）為確保上述過程的有效實現，一個為被壓迫階級挺身戰鬥的黨有其必要。而在此政黨中，組織與施令的角色乃由作為先覺的知識人充當，工人的角色則是實際的武裝行動；（3）此一政黨的理想典範毋寧是標榜紀律與服從的軍隊，最高權力單位為中央委員會，由它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訂定所有的方法步驟。⁴⁴

整體而言，透過環繞列寧革命事業的爬梳整理，郭松棻發現：⁴⁵

列寧經常說政治上沒有任何任何道德，只有權宜之計。所謂權宜之計，就是迫於客觀形勢而不得不然的意思，從俄國革命看列寧主義的形成過程，的確可以了解列寧迫於形勢的許多做法，但另一方面，列寧的強烈意志也經常製造形勢，列寧主義不完全是形勢造成的一個被動理論。⁴⁶

所謂的「迫於形勢」概指前述 19、20 世紀之交，俄國特殊的國際與國內處境。這遂也致使列寧主義從其根本就是一個處於特定的時空情境（上個世紀末前後的俄羅斯）中的特定個人（列寧及其黨徒）對於馬克思理論重新脈絡化的另類詮釋。然而就算按照列寧的獨到見解，革命也絕非從此克竟全功；相對於此，列寧主義留下的問題可能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棘手。延續前面引文對於列寧主義「迫於情

⁴³ 其間錯綜複雜的爭辯詳見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行動中的列寧主義（五）〉，《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 175-204。

⁴⁴ 同前註，頁 176。

⁴⁵ 為了廓清郭松棻投射於列寧主義的期待（冀能為革命失敗尋求解方），以及求之未果的落空，以下數段仔細梳理郭氏圍繞「行動中的列寧主義」展開的討論。換句話說，此處的問題不完全是郭松棻闡釋的適切與否，而是他由此演繹出怎麼樣的結論。從左翼出發，郭松棻對於列寧（主義）的描繪相對肯定其在窘迫情勢中力求主動的積極意義（雖然他也批判埋藏在列寧主義中的極權因子），另一種較為負面的詮釋可參考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New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在本書的濾鏡中，列寧非但距離民族革命英雄相差甚遠，他甚至是一名與境外勢力（尤其德軍）勾結的叛國者。

⁴⁶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行動中的列寧主義（五）〉，頁 197。

勢」的闡述，郭松棻緊接著寫下：

從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一年的狀況可以看出，列寧早有一黨專政的構成和壓制反對意見的傾向。十大全會正式通過決議後，列寧的黨就逐漸變成一種聲音一種行動的政黨，而蘇聯也將成為無聲的蘇聯，憲法上規定的自由只能用在批判當權者指定的叛徒上，對付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的死屍，人民有絕對的自由和民主。蘇聯人民對昨天的錯誤可以發言，對今天則束手無策，對明天更是茫然未知。⁴⁷

換句話說，列寧主義早已埋伏一黨專制，乃至一人獨裁的陰影。而從列寧的影子中脫穎而出的史達林，面對綱領的危險因子：少數人（黨）的專政如何過渡到無產階級的專政？而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軍事化統御與黨的民主化許諾之間又該如何權衡折衝？⁴⁸史達林主義顯然不能（或不願）解答此二提問，而是全面敵體化黨內的異議者以求捍衛黨領導的絕對正當。據此，郭松棻承認「卡繆的疑難並不是無的放矢……無產階級不但從來沒有專過政，而它的利益一再被出賣，一再被葬送在共黨的黨內鬥爭裡面」，而可怖的是，這些負面遺緒其實都能夠在列寧所擘劃的政治藍圖中得到理論支持（如上引文所示）。⁴⁹若果如此，無怪乎在他對於戰後西方自由主義分化的終極結果——列寧主義——系列析論的最後，郭松棻乃是引用了列寧的批判者蘿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的一則評論代為總結：「工人階級中的傑出人物不時被邀出席會議，在那裡他們得向領導人物的演講鼓掌喝采，對提議的各項決議表示一致贊同」。⁵⁰

分析至此，我們當可重新評估前行研究中的某些判斷：在黃錦樹針對「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系列論著所做的解析中——焦點仍相對侷限在釐清郭松棻如何詮釋卡繆與沙特的辯論——他最終推定，郭松棻的同情革命畢竟難以擺脫馬克思主義者「神學式的『終目的論』」，遂顯示出「倫理學上的失足」以及在「意識形態上的自欺欺人」。⁵¹循此，黃錦樹自然也對郭松棻的著墨列寧主義不以為然。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同前註，頁 176。

⁴⁹ 另見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六）〉，《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 211。

⁵⁰ 同前註，頁 215。

⁵¹ 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頁 254。

但是透過上面的分析，識者應可確實體認，郭松棻並非盲目地推崇列寧主義，恰恰相反，郭在文章中相當清楚地揭露其中業已埋下的極權主義風險，並且有所批判。唯其如此，郭松棻才可能成為一個如班雅明般，饒富憂鬱——失去可同一（identification）對象後的茫然——⁵²氣質的書寫者。

（二）回不去的「中國」

事實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歐洲各民族逐一完成了統一，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以後，社會主義的國際精神就被勒困在國家的範圍內，而難以跳出日益森嚴的國家圍牆。民族國家這一個因素，在人類現代史上起著重大的作用。這是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馬克思當然沒有預料到的一個新發展。七十年代的今天，在回顧和前瞻社會主義運動時，這個因素不能不成為討論的起點。⁵³

在顯露列寧主義的構造，同時廓清引導它走向的歷史潮流後，郭松棻提出上列引文的觀察。上引文來自「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析」的第五部分，亦即〈行動中的列寧主義〉，郭松棻在此試著概念化列寧形塑自己主張的時代背景，而得出「現代歷史發展的基本單元是國家，而不是階級」的結論。⁵⁴循此郭松棻特別指出，民族國家的因素實為站在「七十年代的今天」回首社會主義革命歷史時，無從迴避的後設視角。基於此，郭松棻發展出其人的列寧解讀：當一次大戰激起俄國民族主義同仇敵愾（從而按耐國內的階級衝突）時，國際主義者列寧也不得不「迫於形勢」而調整行動的方針。回到「七十年代的今天」，郭松棻自己也面臨怎麼設法溝通共產革命與民族主義的難題。眾所皆知，在保釣運動時，郭松棻隸屬於左統路線，企圖藉由社會主義來搓合對峙於臺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中國。而在七四年之後，留待郭松棻處理的難題更添加了一道：何以毛主義領導的中國革命，其走勢竟如同貫徹史達林主義的北鄰蘇聯，均演變得如此荒腔走板？而此二疑難中的

⁵² 此處參考佛洛伊德對「憂鬱」（melancholy）的定義。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宋文里譯：〈憂鬱與哀悼〉，《魔鬼學：從無意識到憂鬱、自戀、死本能》（臺北：心靈工坊，2022年），頁122-141。

⁵³ 郭松棻：〈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行動中的列寧主義（五）〉，頁178。

⁵⁴ 同前註，頁177-178。

後者無疑更為關鍵，因為倘若中國革命的經驗不足為訓，那麼左統有什麼理由說服臺灣人民非得接受社會主義的統一大業不可？

在這個意義上，不論郭松棻回顧列寧主義的原初場景多麼言之成理，洞見頻仍，他也必須效法列寧的「迫於形勢」，將自己挪來的他山之石再進一步轉換到「中國」的語境之中。然而郭松棻卻從未如他對蘇共的深切反思般，就中國革命問題發表意見。⁵⁵似乎急欲背對中國一般，在完成「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系列文章後，郭松棻另開戰場，耗費相當的精神致力從事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聖地牙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 1915-2012）《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1977）一書的中譯。⁵⁶1968年，在蘇聯揮兵捷克熄熄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之後，西歐的共產主義者——特別是義大利、法國與西班牙——徹底對蘇聯體制失望，包括卡里略在內的共黨領袖連袂發表歐洲共產主義的轉向，不再亦步亦趨追隨蘇共的指導；其人決心在自己國度的歷史與體制內部，為社會主義的實踐開闢道路。我們可以推測郭松棻應當也是想在卡里略等人的主張中釐清革命未來動向的航道，於是才幾乎同步地在隔一年就著手翻譯《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

不過結果恐怕要令郭松棻失望：卡里略在書中開門見山表示，他的推論限定在西班牙這個國度的客觀條件之上，至多僅可為和西班牙處於相當發展程度的國家援為參考。⁵⁷敏感如郭松棻當然意識到卡里略等人掀起的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的地域性限制。在一篇訪談中，郭松棻清楚指出，在歐共力圖擺脫蘇聯（東方）箝制，回到馬克思原典精神的同時，其人卻無力克服作為十九世紀產物的馬克思理論，其以西方（更嚴格來說：西歐）為中心的缺憾。與此同時，身為政黨性存在的歐共，本質上就不能豁免於它在本國之內的政黨利益：這在現實政治的層次上論證了卡里略所說的，其人理論有其滋長於西班牙一國之

⁵⁵ 郭松棻在其後的若干訪談中雖然談及自己的保釣參與，也留下篇幅短小，以文革為背景的〈姑媽〉（下面會討論到這則作品），但比起保釣期的政論，亦或「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郭在中國革命的話題上著力不深。當然，我們不妨也可視郭氏對蘇聯的批判乃是其人對中共體制的迂迴指涉，如同前述。

⁵⁶ 關於郭松棻的翻譯卡里略，顧正萍同樣有非常詳細的摘要，見顧正萍：〈郭松棻的政治思／理想試探〉，《從介入境遇到自我解放：郭松棻再探》，頁87-106。

⁵⁷ 聖地牙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著，羅安達（郭松棻）譯：〈第一章：國家對社會〉，《抖擻》第29期（1978年9月），頁20。

內的先天條件。⁵⁸

換句話說，在視「國家」為推進現代史主要推力的這一點上，卡里略與郭松棻算是所見略同，卡氏在其著作的第一章就指出，國家體制功能在晚近複雜並且精細的發展，使得當代在反思馬克思哲學時，不能不將國家視為首要變因。⁵⁹不過反諷的是，照此疏遠國際主義的邏輯，對彼時的中國而言，《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的論述大概莫過於隔靴搔癢，難以發揮實效。而歸根究柢，在列寧考量俄國的有限條件的狀況下，又或者在歐洲共產主義凸出歐陸國家歷史獨特進程的語境中，馬克思原典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願景應當如何兼顧，乃至當階級矛盾的國際普同遭遇民族團結的草根呼籲時，怎麼不淪為可有可無的雞肋，凡此皆成為社會主義走向本土化時露出的軟肋。而隨著歐共逐漸被整併進歐洲國家的議會體制內部，從此卸除抗衡資本遊戲規則的武裝時，左翼的批判論述的確難逃淪為新自由主義這間百貨公司琳瑯滿目的櫥窗中一項時髦（或懷舊）商品的命運。⁶⁰

《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的翻譯在第四章戛然而止，郭松棻這個時候陷入嚴重的精神崩潰；⁶¹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變化，從精神史的角度看，其實其來有自：那恐怕是知識人戮力上下求索，終於此前無路的必然反應。癒後復出的郭松棻不僅放棄譯出卡里略著作剩餘的章節，他甚至從此不再撰文分析國際社會主義的脈動，遑論闡述中國革命的歷史；相對地，他毅然決然將重心完全轉移到小說創作之上。不過不若柏克萊同志劉大任呼喚〈遠方有風雷〉（2009），或同校的張系國（1944-）筆下較為折衷的《昨日之怒》（2002），紛紛觸及柏城釣運各派對兩岸前途莫衷一是的針鋒相對，⁶²郭松棻的小說即便觸及歷史現實，主要也是二二八

⁵⁸ 李怡訪談、整理：〈長期鑽研理論的郭松棻〉，《知識份子與中國》，頁 190-191。

⁵⁹ 聖地牙哥·卡里略：〈第一章：國家對社會〉，頁 21-22。

⁶⁰ 認為卡里略的提案毋寧重蹈布爾喬亞國家觀念覆轍的批判，見如 B. T. Ranadive, "Carrillo's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Social Scientist*, vol. 7, no. 3 (Oct., 1978), pp. 3-35. 而在卡里略過世的時候，較諸西班牙主流媒體稱讚卡氏在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專制解體後，對維護西班牙主權完整樹立重要貢獻，左翼中較激進者卻批判他背棄共產理念，犧牲工人權益。見 Patrick Larsen, "Santiago Carrillo (1915-2012): The Man Who Betrayed Two Socialist Revolutions," *In Search of Marxism*, 26, Sep., 2012, (source: <https://www.marxist.com/santiago-carrillo-1915-2012-the-man-who-betrayed-two-socialist-revolutions.htm>, 2023.2.9).

⁶¹ 簡義明訪談、整理：〈郭松棻訪談錄〉，收入郭松棻：《驚婚》，頁 209-210、212。

⁶² 劉大任：〈遠方有風雷〉，《遠方有風雷》（臺北：聯合文學，2010），頁 13-163；張系國：《昨

（〈月印〉〔1984〕）亦或白色恐怖（〈草〉〔1986〕）等左右戰後臺灣民族命運的歷史事件。郭松棻對於壯年時期自己的左翼革命志向，以及攸關中國統一問題的思考彷彿諱莫如深，他的安靜，兼以反反覆覆的癖性，讓我們不免會疑惑郭是不是已轉向臺獨。畢竟從還是革命青年的時期開始，郭松棻一直都對臺獨懷抱同情的理解。⁶³

郭松棻的國族意識形態有無產生裂變？實質如何，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其人的沉默絕對耐人尋味。香港《七十年代》總編輯李怡（1936-2022）曾對世人以為郭松棻的沉默等同龜縮提出異議；李怡為香港左翼／保釣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乃是郭松棻因保釣而淪為黑名單後，最早與郭接觸的文壇中人之一。李怡認為：「七四年到中國訪問使他失望、沉默是事實，然而他並非什麼都不幹，而是非常忙碌地進行革命理論的探索。」⁶⁴循此，我們無疑也可將郭松棻的埋首革命理論，及其人的翻譯歐共著作，解釋為「發聲」的一種管道。如此一來，沉默不僅是不知從何說起的欲說還休，也可以是對於任何化約標籤的拒絕；而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沉默無非都在暗示某種有所抉擇的，展示其人處境立場的姿態。⁶⁵而若要理解郭的沉默，他的無法言說，又或拒斥（disavow）——通過精神分析的濾鏡，拒斥顯示的不啻一種「口嫌體正直」的迂迴承認——⁶⁶此前橫跨革命與統一的左統願景，左翼憂鬱許是一個值得借鏡的談法。

自從廿世紀以來，左翼行動幾經頓挫，有志之士為革命吶喊卻也不無徬徨，患得患失情緒的攪動下遂產生左翼憂鬱的說法。⁶⁷而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新自由

日之怒》（臺北：洪範，2002年）。

⁶³ 見如郭松棻著，李渝、簡義明編：〈在美臺獨運動的批評：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至三日在柏克萊加大舉辦的〈中國問題研習會〉上的報告〉，《郭松棻文集：哲學卷》，頁169-178。劉大任對郭松棻晚年境況有第一手的描繪；當然，劉不認為郭松棻靠攏臺獨。見劉大任：〈松棻走了〉、〈回憶松棻二、三事〉，《晚晴》（臺北：印刻，2007年），頁104-109、110-114。

⁶⁴ 李怡訪談、整理：〈長期鑽研理論的郭松棻〉，《知識份子與中國》，頁186。

⁶⁵ 唯獨這一姿態究竟何所指，何所為，需通過更細心的推敲，此即下文藉由「左翼憂鬱」而將展開的推論。

⁶⁶ Sigmund Freud, "Fetishism,"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1*, ed. &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95), pp.149-157.

⁶⁷ Tu Hang, "Left Melancholy: Chen Yingzhen, Wang Anyi, and the Desire for Utopia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3, no.1 (Spring 2021), pp.122-129. 如同該術語中「憂鬱」一詞暗示的，左翼憂鬱原初指稱的是一種心理／病理的失

主義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大行其道，左翼的處境愈發苦悶，左翼的憂鬱究竟是行動的絆腳石，又或者憂鬱其實複雜了革命的內涵，在晚近重新激發辯論。⁶⁸扼要言之，左翼憂鬱的學說一方面參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對憂鬱與哀悼（mourning）的區分：這一組心理障礙表面的症狀趨於一致——患者均受困極度悲痛之中——然而後者可以指認自己所失去的是什麼，前者則不明所以，膠著於悵然若失的負面情緒直至癡狂（mania）。⁶⁹另一方面，為了替困於無以言說的憂鬱中進退失據的左翼打破僵局，當代理論家試圖以「希望原則」（the principle of hope）的遺失來釐清社會主義陣營的所逝摯愛；桎梏於維護既有體制的「責任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革命（一種改變、乃至現況的行動）的呼籲陽春白雪，難起號召。⁷⁰

放在郭松棻的案例中來衡量的話，前面提及，郭投入保釣以後，革命熱血促使他放棄博士學位，奔赴紐約處理中共在聯的組織工作。這一抉擇無疑可視為乃郭秉持「希望原則」而痛下的決心。不過隨著七四年訪中後的幻滅，以及其後研讀共產主義文獻（如卡里略專書）仍未能解開心中的迷惑，凡此都讓他在聯的工作——其實無非是翻譯文件一類的文書庶務——逐步淪為「責任原則」下，日復一日，只為確保組織如常運作的螺絲釘般的平庸事務。郭松棻嘗言七〇年代末期以來，自己除了經歷數次憂鬱症導致的精神崩潰之外，身體狀況也隱約出現狀況，終於不幸中風。⁷¹事實上，「憂鬱」（melancholy）的希臘文字面意義指的原是「過

能，批評家藉以鞭斥左翼自甘陷入耽溺於內在深淵，麻痺於外界現實的失卻革命能動。但也因為「左翼」元素的加入，此一論述取徑又無可避免地凸顯著革命的精神官能症總是牽涉連動特定歷史語境。吾人從而發現，左翼憂鬱未必就是屏棄現實；相反地，陰翳的社會主義者恐怕才是洞穿革命困境的先知。進而言之，以下將會在「左翼憂鬱」與「臺灣憂鬱」之間連結類比。此一關聯來自施淑，她藉此引導出長久困擾非西方左翼的一道難題：革命究竟是「本土／民族的」，或是「國際／階級的」？而這不啻亦屬郭松棻縈於懷抱的核心命題，我們一方面在郭氏研讀列寧、翻譯卡里略後的結論中可找到其人省思的軌跡；另一方面，下文也會在臺灣文學史的人間條件中檢視這個話題。

⁶⁸ Enzo Traverso, *Left-Wing Melancholia: Marxism,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⁶⁹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宋文里譯：〈憂鬱與哀悼〉，《魔鬼學：從無意識到憂鬱、自戀、死本能》，頁 122-141。

⁷⁰ Enzo Traverso, *Left-Wing Melancholia*, p.6.

⁷¹ 見如簡義明訪談、整理：〈郭松棻訪談錄〉，收入郭松棻：《驚婚》，頁 183-184。

多的膽汁」；內心的折磨和身體的潰敗實為一體的兩面，身心的苦難總是相偕而至。在這個意義上，郭松棻一絲不苟的文體上雕塑的不止於現代主義的「骨感」，⁷²藉此，他更志在實踐未竟的革命，而他的病體顯示的毋寧也是左翼憂鬱延異的軌跡。

進而言之，左翼憂鬱的論述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尤其海外的場域中也受到矚目。事實上，在上世紀中期以還，特別在史達林主義激起天怒人怨以後，中國革命的起落屢屢牽動西方左翼士氣的興衰：1955年，西方左翼的精神象徵沙特，協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等人蒞臨天安門廣場，一行人觀賞中共國慶大典，深受共和國氣派的震動。返法後沙特高度讚許中國革命的前瞻性，這名左翼大師的認可對於毛主義在歐洲，乃至全球六〇年代反叛浪潮的風靡，產生推波助瀾的實效。然而誰都沒想到，34年後的1989，在同一地點竟爆發舉世震驚的六四鎮壓。此時西方左翼已先後遭逢東歐與中南美洲共產願景的接連失敗，中國革命接踵而來的墮落更進一步陷其人於憂鬱的泥淖。⁷³但是無論如何，較之於社會主義體制在西方未曾真正落實——在尤其是西歐國家看來，蘇聯／俄羅斯其實屬於廣義的東方（oriental）陣營——⁷⁴中國畢竟是碩果僅存的最主要共產政權，當代中國文學從其根本皆孵育於中共治下。若然，則其人其作的憂鬱表現理當另有局面；一如馬克思主義需要在地轉化，左翼憂鬱沒理由不扣合本土語境。比如王安憶（1954-）不將共黨教條、革命宣傳縈於懷抱，卻在生活氛圍和瑣碎細節上，體現她訴諸唯「物」主義的獨家詮釋，並以此回應後社會主義中國鋪天蓋地的市場化風暴。⁷⁵

但是當範例變成郭松棻，一個從小在大稻埕成長的本省人（大稻埕乃本土意

⁷² 王德威：〈冷酷異境里的火種〉，收入郭松棻：《奔跑的母親》（臺北：麥田，2002年），頁4-5。

⁷³ 中國革命與天安門事件在西方左翼論述中的位置，見如 Po-hsi Chen, "Socialism on One Island: A Genealogy of the Pro-Unification Literary Discourse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Yale University. 2020, pp.126-128.

⁷⁴ 「東方共產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是冷戰時期經典的意識形態二分，郭松棻也清楚指陳這一框架對臺灣文學生產的影響，見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32。

⁷⁵ Tu Hang, "Left Melancholy," pp.122-160.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見傳人：王安憶論〉，《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2002年），頁35-53。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的左翼憂鬱，它指涉的是更寬闊的歷史情境（亦即後社會主義中國）中人／物境遇的曲折變化。畢竟從實證意義上來說，王安憶並未立足於明確堅實的左翼立場。

識最活躍在地社群之一），兼以流亡，卒而終老美國的黑名單經歷，他的左翼憂鬱在性質上應如何義界甚至愈加纏結：郭的處境條件固然迥異於王安憶，明顯也和外省籍的劉大任，或者活躍於島上的陳映真有所差別：以劉大任〈遠方有風雷〉這篇有高度紀實性的作品來說，書中的主要的角色大部分都出身外省族群，乃至於具備相當的大陸生活經驗，他（她）們憧憬的遂不免是祖國的統一。而故事另有一名臺灣本省籍的小吳，他被描寫成讀書小組（一種學運社群的經典模式）內部的「破口」：顯示為小吳辜負同志美意，並且走向臺獨。小吳在故事中也曾被呈現為體弱，甚至有些猥瑣的形象，大相逕庭於來自革命世家，氣宇軒昂的雷霆。⁷⁶然而小吳式的蒼白「小鎮知識人」卻是郭松棻，又或者陳映真筆下念茲在茲的人物典型。至於陳映真，雖然他的小說主題與書寫風格都相對接近郭松棻（比如兩人對白色恐怖下小鎮知識人的精神史都有深刻的描繪），只不過對比於在意識型態的座標圖上總呈現偏離姿態的郭松棻，陳映真對他的左統立場懷抱近乎宗教的強勢捍衛，儘管這也導致其人作品容易出現教條訓示之虞。⁷⁷

此外，儘管郭松棻在七四年大陸旅行後，便幾乎不再提起中國革命，不過只要將關注點稍微往前挪，回到七〇年代初期郭松棻參與保釣期間撰寫的政論文章，我們仍可覓得解謎郭松棻左翼憂鬱的蛛絲馬跡。僅就目前收錄於《郭松棻文集：保釣卷》中的文獻來看，我們也不難發現，在保釣階段，郭松棻雖然逐漸左傾，行文中經常或隱或顯流露馬克思派的思維套路，但是郭氏論述的主要內容，其實更著重在臺灣島內差異族群（主要指本省與外省）間的歧異衝突，應當如何化解。而對此一問題的考慮設想，它深層的目的毋寧是喚醒臺人的「民族」意識。⁷⁸並且，相較於在打造左翼論述的骨幹時，郭松棻多半採取反面立說，大致透過批判以雷震（1897-1979）與殷海光（1919-1969）等人為代表的自由派學說，⁷⁹從而

⁷⁶ 有關〈遠方有風雷〉，可參考張政傑：〈東亞「風雷」如何殘響？臺灣「保釣文學」與日本「全共鬥文學」的比較研究〉，《中外文學》第48卷第2期（2019年6月），頁85-130。

⁷⁷ 王德威：〈最後的馬克思：論陳映真〉，《後殖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臺北：麥田，2007年），頁195-202。

⁷⁸ 社會主義的國際參與與反殖民族解放如麻花捲般糾纏在一起，乃是中國／臺灣左翼的固有特徵。可參考松永正義著，李尚霖譯：〈關於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彭瑞金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5）：葉石濤》（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年），頁325-332。

⁷⁹ 郭松棻保釣時期對自由派的批判，以及郭民族主義言說的變化軌跡可參考鍾秩維：〈殷師的池塘：郭松棻的〈秋雨〉及其七〇年代的政治與思想轉折〉，頁760-767。

反襯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可行——儘管這樣推導出來的共產社會，其具體內涵多半籠統含糊——至於論證民族問題時，郭的發言反倒確實可感，相當歷史化：我們可以從郭氏言說中，清楚地明白省內外之所以隔閡的來龍去脈，亦能夠同情地理解臺獨意識形態崛起的因果邏輯。⁸⁰換句話說，此時的郭松棻已經在實踐社會主義理論的落地轉譯，他正在將誕生於 19 世紀歐陸的哲學，置放在 20 世紀的「中國」語境中摸索。

不過對於一個在臺灣生於斯長於斯，後來生活於海外的流亡本省人，這個「中國」所指的究竟是什麼當屬一個問號。一方面，其實在郭松棻的保釣著述中，不論他反駁自由主義議程以正當化社會主義路線的立場之爭，亦或是援以為社會主義在地化土壤的實際範例（亦即臺灣），郭闡述的對象都不是共產中國；相反地，他試圖溝通的乃是被依附於美日的國民黨勢力所盤據的「自由中國」在臺灣的人民：他意欲喚起的是島內「一千四百萬」同胞聲援左翼中國的民族意識。⁸¹但是此一「民族」土壤的整體性如何，恐怕啟人疑竇；包括郭松棻自己都曾跳出來斥責部分（海外）「中國」人的「大國沙文主義」與「臺獨極端主義」分化團結，務必革除。⁸²另一方面，即使從保釣時期的郭松棻看來，中國革命郁郁乎文哉，捨身從之在所不辭，但是當左翼濾鏡被剝除摘下，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悲劇迎頭痛擊，徹底粉碎郭氏的中國統一夢。此時郭松棻為了滿腔熱血的革命理想早已遭自由中國攆逐，然而共產中國兇殘荒誕的演變同時掏空他為左翼行動與統一主張苦心筆畫的設計圖：回不去的中國革命，以及回不去的中國／臺灣，左（社會主義）與統（民族主義）的雙重落空，這毋寧是郭松棻左翼憂鬱的本質。

⁸⁰ 譬如郭松棻：〈把運動的矛頭指向臺灣：一九七二年四月八日於明尼蘇達大學「保釣委員會」舉辦「臺灣、中國問題討論會」上的報告〉，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頁 242-256。

⁸¹ 根據郭松棻，這是保釣時期臺灣的總人口數，也是他的政論文章頻頻喊話致意的對象。

⁸² 郭松棻：〈臺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頁 147-168。

（三）重返臺灣／文學

郭雪湖以臺灣風土納入繪畫創作而在臺灣美術運動中有了他自己的特色，但表現鄉土並不是他的最終職志。他並不是為了鄉土而鄉土的畫家。家園風物只是他創作中的素材，藝術的冀想則投在別的地方。⁸³

這與中國文人畫傳統所講究的疏淡、閑遠、優遊的趣向，恰向背馳。這裡不追尋天人的契合，也沒有容人遨遊的餘地。這是新的繪畫性格的開拓。這裡人與自然之間不能說完全沒有融洽之處，而更強調的是，融合中的神人相競。或更確切地說，強調人在自然力中的不甘於被埋沒。這是臺灣先民的拓疆精神，充分展現了征服海障尋求新生活的海洋性格，內陸文人畫中的佛／道觀不能作為這裡的欣賞或批評的準則。⁸⁴

1989 年對於海峽兩岸都是劇變的危機時刻，夏天，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剛剛落幕；而在臺北，一場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正在中正紀念堂（或中正廟）廣場集結：大陸廣場上的事件標誌中國革命的墮落，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山雨欲來與左翼憂鬱的無力回天即將連袂降臨；島嶼廣場上的抗爭卻鼓動臺灣在冷戰落幕前後，終於完成無流血的民主轉型，非常象徵性地背書美國過去半世紀向世界推銷的民主腳本，也加速兩岸在政體距離上的愈拉愈遠。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千頭萬緒：處於這樣的危機時刻，返回創作崗位將屆十年的郭松棻，一如過去十年，未對中國革命的進展公開發言，「彷彿與他毫無關係」的冷肅姿態引人側目；⁸⁵在 1988 年底與 1989 年初之間，他正膠著於一己的地獄，嚴重的憂鬱症再次惶惶然威脅其生活。另外一方面，隨著 1987 年臺灣解嚴，郭松棻的名字終於自黑名單上撤

⁸³ 郭松棻：〈一個創作的起點〉，《當代》第 42 期（1989 年 10 月），頁 84。

⁸⁴ 同前註，頁 88。

⁸⁵ 「彷彿與他毫無關係」李怡（1936-2022）的說法。李怡曾在六四不久以後見到郭松棻，而驚訝於郭松棻迥異於一般北美華人的激憤，「對這事件一言不發」。李怡：《失敗者回憶錄（上卷）》（臺北：印刻，2023 年），頁 302。但當時郭松棻肯定知道六四事件的演變，因為李渝在第一時間就接連發文哀悼學運與聲援改革，見如李渝：〈永遠不失去希望〉、〈六月是花開的季節〉，收入梅家玲、楊富閔、鍾秩維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頁 100-101、102-107。

銷，他好不容易在 1989 年重回闊別多年的故鄉。⁸⁶也是人子的郭此行的目的是參加「郭雪湖 70 年作品展」，在家人的敦促下，他亦為父親作品撰寫藝術評論〈一個創作的起點〉：這竟是郭在 1986 年發表小說〈草〉之後，以及 1993 年出版《郭松棻集》之前，唯一一篇公開的文字。

〈一個創作的起點〉除了是這七年間僅見的發表外，在許多意義上它亦屬別具複雜意義的重要文本：首先，它是罕見於郭松棻作品中的文藝評論。況且本文在郭本人重回文壇十週年之際寫成，所評論的對象一方面是父親的作品；另一方面，郭雪湖在畫中描繪的景物人世，亦是郭松棻生長於斯，同時屢屢挪為小說底蘊背景的臺北西區（尤其圓山與大稻埕一帶）。⁸⁷據此，我們不妨也試著透過自況的視角，來揣想題名「一個創作的起點」的隱含意義。再者，郭松棻寫於文中的意見（如本小節甫始兩段引文所示）原則上環繞鄉土，以及鄉土（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獨到特殊此二主軸衍生；換句話說，它閃爍本土主義的燈號，遑論「海洋性格」也是本土派樂於援以證實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核心元素。⁸⁸這些本鄉本土的連繫遂使〈一個創作的起點〉一躍而成足以衡量郭松棻政治意識形態的盤整，乃至於轉折的楔子。⁸⁹

不過郭松棻並不畫地自限於民族主義論述，他認為藝術創作的自主凌駕任何意識形態主導的歷史詮釋，進而斷言鄉土（或本土）並非畫家處理畫面時的終極意向。現實境遇雖然是吾人都需要承擔的人間條件，但奠定於現實不意味拘泥於現實；尤其在藝術的領域裡，創作的環境固然被現實狀況所劃定，創作的心靈卻仍總是憧憬「非人間性的」他方，一個夢（想）中的彼岸：⁹⁰

⁸⁶ 郭松棻曾說明他終於得以返台的曲折過程，簡義明訪談、整理：〈郭松棻訪談錄〉，收入郭松棻：《驚婚》，頁 225。

⁸⁷ 在〈一個創作的起點〉中，郭松棻主要分析的畫作包括〈圓山附近〉（1928）與捕捉大稻埕繁華盛景的〈南街殷賑〉（1930）等作。

⁸⁸ 張隆志編：《島史的求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頁 1-24。

⁸⁹ 以下討論基本上藉由〈一個創作的起點〉來廓清郭松棻此一階段文藝觀念的演變，亦即將這篇評論讀成郭氏的自況。而當然，本文對〈一個創作的起點〉的解讀亦有可能真正應用在郭雪湖畫作的分析評論上，唯這實已超出此處關心的範圍，限於篇幅，只能先按下不表。

⁹⁰ 郭松棻：〈一個創作的起點〉，頁 86；彼岸（與相對應的此岸）說法同樣來自郭松棻，見郭松棻：〈喜劇·彼岸·知性：談木心的散文〉，《中報·副刊》，1986 年 6 月 20 日。

然而這不止於歷史的紀錄，這也不是一幅單純的農耕圖……不限於生活層面的觀照。繪畫的視點定置於人間而又超乎人間。這超過的部分就構成了一個夢境，樹園中那奪目的林光爛漫綠意滌蕩就是這夢的君臨，只是這夢的君臨並不出奇，純粹的夢境是容易做成的。這夢要君臨到那淳厚勤勞的農夫面前才有了意義。唯有在開拓新天地中歷練了披斬荊棘的艱苦，夢才做得真切，夢才會纏綿。對於農夫農婦來說，一塊夢土是他們拗強的意志和新世界追尋的縫合，是他們和堅實純樸的生活締結的誓約，對先代犧牲的永遠繫念和未來豐饒的無限銘緬，而這種的慕情最後都在綠意滌蕩中歸入無言。⁹¹

這一段發言綜合著鄉土的國族寓言，涵括階級（小農）的現實情況，更兼及藝術理念的闡釋，對於理解郭松棻八〇年代以還的寫作事業與政治／思想轉折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材料。實際上，十五年前，當郭還在釣運的左統陣營時，他的〈談談臺灣的文學〉已經賦予鄉土寫作若干方向：首先，儘管此派作品以鄉土為題，但不宜流於採集風俗的懷舊戀物，「主題就是鄉土的單純描繪」並不足取。⁹²其次，鄉土作家不應自囿於狹窄的鄉村視野，他（她）的關懷需能夠進一步「代表近代亞洲人的命運」；⁹³也就是說，鄉土派既要洞悉歷史發展的宏觀格局，與此同時亦務求體恤區域被殖民者全體的不幸。如果將前者與〈一個創作的起點〉並讀，特別和後者中「表現鄉土並不是他的最終職志」以及「他並不是為了鄉土而鄉土的畫家」等語句相互對照，⁹⁴不難發現郭松棻在批評標準上其實自成一套一以貫之的原則。要言之，即使在最親近左翼理念，熱心政治參與的七〇年代，郭松棻仍相信書寫必然懷抱有別於現實，抗拒屈從於意識形態的他方；然而在遠離社會運動，重新接榫現代派軌道之後，郭松棻也不忘提示認識歷史的實然面對寫作者而言不可或缺。而這似夢非夢，與人間現實若即若離的臨界狀態，彰顯的興許是作品本身的「顯現／在場」（presence）。換句話說，書寫總是發生於某個介於

⁹¹ 郭松棻：〈一個創作的起點〉，頁 88。

⁹² 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 40。

⁹³ 同前註。

⁹⁴ 同前註，頁 84。

之間的閹限（liminality），而文學所示、所在的世界僅僅是其自身的所述之言。⁹⁵

回到郭松棻生命史的情境：儘管兩篇文論有其連貫的邏輯，只不過十五年來總體形勢和個體生命均迭經動盪，郭松棻的想法不可能一成不變。從〈談談臺灣的文學〉到〈一個創作的起點〉，主要的變化體現在前述的後一個意見。置於該文的語境中，第二項意見針對的乃是「偷取西方書架上的那些感情」，誤信西方（殖民者）意識等同於普世價值的現代派；循此，回到亞洲人（被殖民者）境遇的呼籲所強調的遂不外乎差異區域（例如亞洲）歷史軌跡的獨一無二；⁹⁶接著推導下去，其終點毋寧是「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的分化」陳述的結論：列寧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誕生在特定形勢下的折衷論述。此概為七〇年代郭松棻鄉土言說發展的大體流程。唯獨在〈談談臺灣的文學〉時期，除了反殖的民族主義之外，郭且同步站穩左翼國際主義的立足點，倡議鄉土文學勢需闡連現代亞洲人共通的被殖民悲劇，藉以締結聲勢更浩大的左翼聯盟。不過如前所述，隨著郭松棻對蘇共，對歐洲共產主義的涉獵愈來愈深，他將沮喪地見證，共產主義的現世實踐反而距離馬克思所期待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愈來愈遠。畢竟倘若蘇聯、歐洲，乃至中國都有自己無法與共的特殊形勢，那麼有關社會主義理想如何落實的唯一真理恐怕僅剩下言人人殊。

如此邏輯理路搖晃鬆動的不單單是郭松棻的左翼設想，也是他為鄉土（中國／臺灣）擘劃的藍圖。前面環繞左翼憂鬱的分析已清楚揭露，歸根究柢，郭松棻的左（中國革命）與統（中國／臺灣）攸關的都是島嶼的前途，那麼將這道裂痕放回臺灣文學史（尤其鄉土文學論戰）的語境中來透視檢驗，就有其必要。以下將試著指出，郭氏文學重複重返的夢想之地「臺灣」，一如〈一個創作的起點〉沉思冥想郭雪湖畫面後的所得，乃是一個交織錯綜著民族過現未、階級處境與藝術烏托邦的複雜意象。亦或進而言之，臺灣意象在郭松棻文學中，不啻其人左翼憂鬱的徵狀（symptom）。

首先，七〇年代的郭松棻雖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但他的言論並未從此在島

⁹⁵ 循此衍生的自然是郭松棻攸關文學的（非）革命性，寫作的（不）可能性的一系列思辨，可參考潘怡帆：〈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與劉淑貞：〈論寫作，以及它的匱缺〉等前行論述。

⁹⁶ 在〈談談臺灣的文學〉文中，郭松棻非常強調亞洲人集體被殖民的歷史，從而凸出團結對抗西方帝國／殖民勢力的必要，尤見於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 30-40。

上絕跡；如同當時不少被禁制的訊息得以通過海外管道在島內迂迴流播，郭松棻發表於香港的〈談談臺灣的文學〉，文中的核心論旨亦被裝進新瓶中偷渡回臺：⁹⁷揭露這一層面紗的乃是陳映真，其人在後來回顧七〇年代臺灣文學狀況的場合中數次指出，郭氏文章展示的反帝反殖批判術語，乃至於所擊劃的日本殖民下臺灣作家的反抗系譜，都或直接（原封不動）或間接（經過改寫）地為王拓（1944-2016）挪用至他著名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1977）的論述當中，⁹⁸成為王文論據的核心骨幹。而如眾所知，王拓此文正是敲響鄉土文學運動漁陽鼙鼓的雷霆一擊。

王拓文章於4月發表，稍晚一個月後，同屬論戰指標文獻的葉石濤（1925-2008）〈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7）緊接著問世。⁹⁹葉石濤此作與郭、王文章在方法與例證上都呈現相當程度的雷同，尤其展現在三人都採用烙印著鮮明左翼關懷的反帝反殖框架。¹⁰⁰但是，大概因為成長於日殖中後的淵源，葉石濤對戰爭期的「地方文化」論述爛熟於胸；¹⁰¹而長期在臺南、高雄一帶生活的葉，亦更契合南部文

⁹⁷ 簡義明：〈冷戰時期臺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為線索〉，《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2014年4月），頁207-240。

⁹⁸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110-131。陳映真的揭露可參考陳映真：〈前言二：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鈞運統運文獻編委會編：《春雷之後（壹）：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臺北：人間，2006年），頁9-10。

⁹⁹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132-157。

¹⁰⁰ 抱持某種程度的左翼意識乃共通於七〇年代反對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批判論述的一般現象，見松永正義著，李尚霖譯：〈關於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彭瑞金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5）：葉石濤》，頁325-332。

¹⁰¹ 「地方文化」為日本殖民者在戰爭期（1937-1945）階段推動的文化政策，目的在於將帝國統領的諸「地方」（包括臺灣）有機地化為可茲中樞動用的血肉。在臺灣，地方文化論述吸納了以一九二、三〇年代累積的鄉土文學實踐，它開啟一系列圍繞臺灣特殊處境的思辨，而其對照組固然是日本內地。不過帝國之下地方文化的建構卻也出現始料未及的結果：在凸顯自身獨特的情況下，臺灣分離主義意識亦順勢暗暗抬頭。在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即島田謹二（1901-1993）與黃得時（1909-1999）師生在闡述外地／臺灣文學史時，各種陽奉陰違的策略。而其後的葉石濤受到黃得時的影響尤為巨大。見柳書琴：〈導言：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臺灣「地方文化」〉，收入吳密察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2008年），頁1-48；吳叡人：〈重層土著化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

壇的地方動向：¹⁰²這些經驗都促使葉石濤對於臺灣／鄉土的時間空間何以特殊愈發胸有成竹。也就由於葉氏彷彿天然般珍視島嶼質性的獨一無二，〈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為後來本土主義的化暗為明透露訊號。而其中率先接收到此文分離主義信號的，不是別人，仍是畢生捍衛左統理念的陳映真；陳在隔一個月（6月）立即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針砭葉石濤的「臺灣人意識」。¹⁰³而此後四十年，陳映真也將和王拓就左右統獨的意見齟齬衝突，兩位曾並肩前進的戰友漸行漸遠，甚至轉為怒目相向的敵人。¹⁰⁴

基於上述，郭松棻的左翼憂鬱當不只是流亡海外的他，個人層次的挫敗感而已，它直搗黃龍地攪動島嶼身份認同政治的敏感神經。郭松棻的左翼憂鬱遂無非也是一種「臺灣的憂鬱」，指向島嶼剪不斷理還亂的殖民與後殖民歷史。¹⁰⁵事實上，施淑在解讀陳映真早期作品時就指出，廿世紀以來的殖民地反抗運動似乎總無可避免地交織著社會主義（追求普世的階級解放）與民族主義（確立特定的國族認同）兩種殊異的意識型態。而臺灣的處境並且因為一水之隔的中國，或所謂「祖國」，而更顯尷尬：究竟臺灣的抵抗追求的階級解放的國際關連，又或民族自決的獨善其身？是走向自主的殊途殊歸，或回歸大陸的殊途同歸？¹⁰⁶此即郭松

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3期（2009年9月），頁133-163；陳芳明：〈葉石濤臺灣文學史觀之建構〉，《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2002年），頁47-68。

¹⁰² 郭松棻對葉石濤這一脈絡的作家有如下評價：「這一群作家多半生活在臺北之外……在取材和文體方面……在大方向上卻較為一致，而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派別的趨向，相異於軍旅和學院出身的作家。這群作家以吳濁流、鍾肇政、鄭煥、廖清秀、林鍾隆、葉石濤等人為代表……他們都是臺灣籍的作家，生於臺灣長於臺灣，在寫臺灣各種面貌這一點上，其他兩類作家與之相比就瞠乎其後，望塵莫及了。」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38。

¹⁰³ 許南村：〈鄉土文學的盲點〉，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158-165。許南村即陳映真的筆名。

¹⁰⁴ 晚近劉羿宏重新脈絡化王拓的政治生活，而對其人曲折的精神史變化有細膩的詮釋，見劉羿宏：〈論戰、運動、愛荷華：王拓「鄉土觀」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第32期（2021年春季），頁103-130。

¹⁰⁵ 「臺灣的憂鬱」來自施淑對於陳映真的評論見施淑：〈臺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藝術〉，《兩岸文學論集（一）：文學星圖》，頁181-195。

¹⁰⁶ 「殊途同歸」與「殊途殊歸」在日本殖民統治期公共圈的消長演變，見陳培豐：《想像與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2013年），頁171-220。

棻在前一階段——也就是「回不去的『中國』」——苦心思索，仍難以解開的癥結。無論如何，戰後，這一尷尬在爆發於島上一系列省內外衝突的升溫下愈發尖銳激化。面對如此曖昧不明的處境，本土的左翼知識人，如陳映真，亦如郭松棻，其反叛所為何來？其革命所求為何？在在混沌不明。處於因果未能澄清的情況下，臺灣左翼不免只能沉淪於臺灣憂鬱的幻滅之中。

基於上述，我們當可更立體地推想郭松棻重返「臺灣／文學」的不同層次路徑。要言之，郭松棻和島嶼的再闡連（re-articulate），其之「重返」，不一定僅僅是實證意義上的親臨在場；它不限於王拓對郭氏文章的襲用，亦不只是郭實際地在臺活動（發表作品，乃至參觀畫展等等）——其實即便有這些在場的痕跡，郭松棻一生絕大多數時候仍舊處於他鄉異域——甚至郭松棻的重返也無關身份政治格局下的臺灣認同：儘管「中國」夢碎，不過根據劉大任的轉述，郭在生命暮年似乎仍舊反對「臺獨」。¹⁰⁷相對地，八〇後郭在文學上重複地對故鄉（空間）往昔（時間）精雕細鏤地描繪，魂兮歸來（或無法重來）地召喚，興許更是其人重返「臺灣」的象徵甬道。這條由文學所打造的甬道未必直通統獨的決斷，郭松棻以描述（description）（而非敘述〔narration〕）見長的小說筆法，¹⁰⁸也避免（如陳映真與葉石濤一般）對兩岸歷史走向正確或錯誤的道路直球對決。相對地，立足於郭松棻文學撐開的，淡然於意識型態競奪的「抒情（詩）飛地」（lyric enclave），¹⁰⁹回首反思「革命／中國」的烏托邦，與重新發現（乃至發明）「故鄉／臺灣」的想像鄉愁牽連合一，其人作品的現時乃是經由重來的鄉愁（過去）的革命的憧憬（未來）相互闡釋而成：以殖民地文學青年為摹本寫成的革命小說〈月印〉，乃至〈雪盲〉（1985）所描繪的對「島嶼上的父執」與「大陸來的魯迅」同步投

¹⁰⁷ 劉大任：〈回憶松棻二、三事〉，《晚晴》，頁 113。

¹⁰⁸ 在文學理論中，將「描述」與「敘述」對立起來的傳統可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模擬（mimesis）。模擬的觀念一方面強調文類與主題的秩序，以及階序（hierarchy）；另一方面，模擬也主張文學教化人民或洗滌性靈的實用功能。而由此衍生而來的行動（action）與情節（plot）揚舉往前推移、內外衝突的說故事方法，共同造就敘述的優位。相反地，描述——通常透過非整體的局部細節處理和片段的吉光片羽連綴而成（此不啻郭松棻小說的典型特徵）——更為平等（換言之：超越秩序與階序）地呈現「生活」本然。描述與敘述在現代（主義）文學中的消長可見 Dora Zhang, *Strange Likeness: Description and the Modernist Nov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¹⁰⁹ 「抒情的飛地」借自蕭馳。Chi Xiao, *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射無限孺慕情懷的離散臺美人，等等皆為顯例。¹¹⁰若然，我們不妨視郭松棻乃透過文學而與島嶼命運的流變共在。

綜上所述，陳映真／郭松棻／王拓／葉石濤毋寧形成「結構性的同構關係」（structural homology）：¹¹¹各自來看，他們分別構成一套獨特的鄉土論述，並由此擬定島嶼身世的系譜，開立解決階級困境的處方箋；合而觀之，他們又一齊繪製一幅多元多變的左右統獨光譜：如果說陳、葉佔據極端的兩邊，那麼郭、王則比較折衷地遊走在兩端之間；而倘若陳、葉、王高歌的是島嶼此岸的不平之鳴，郭松棻體現的無非一汨來自他方——一處非本土、也非中國認同的「外邊」——的海潮迴響。¹¹²

除了意識形態的協商之外，此處更應該追問，郭松棻的文藝觀念究竟出現怎樣的轉折？〈談談臺灣的文學〉中，郭認為鄉土派要以代現（represent）被殖民者不屈不撓的現實抗爭為任務，要以闡連（articulate）兩岸歷史與人民的趨於一致為職志；不過這般的左統意識形態與社會寫實美學，在訪中前後業已一步步消耗磨損，終以陷入憂鬱為結果。而在〈一個創作的起點〉，即便郭松棻仍舊強調描寫鄉土而不被鄉村鄉俗給侷限，他卻不再將視線逕自投射在解放（無論是民族或階級）的現實要務。相對於此，此時的郭松棻認為現實境遇（此岸）勢必得繞道非現實夢想（彼岸），兩者交疊相融始能蛻變為藝術；而就在彼此互為表裡的激盪之下，文藝於是提昇到許諾的層次。而藝術許諾的，一方面是形式（語言或畫面）的革命，伴隨著新局（所指涉的內容）的誕生；另一方面，那革新亦是人間意義的彰顯與停駐，它將在一個抒情的時刻凝練為永恆的意象／畫面：¹¹³

¹¹⁰ 郭松棻：〈月印〉，《奔跑的母親》，頁 13-112；〈雪盲〉，《奔跑的母親》，頁 165-216。

¹¹¹ 此處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說法。「結構性的同構關係」乃布氏文藝社會學理論的核心觀念，他藉以指稱不同場域（亦即經不同言說規範加以生成產製的象徵空間）之間可相互類比，但彼此不等同的不／均值關係。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88.

¹¹² 郭松棻小說的「外部性」可參考楊凱麟：〈寫作寫作的寫作：論郭松棻的「時間——文字」〉，《中山人文學報》第 50 期（2021 年 1 月），頁 31-54。

¹¹³ 而「如畫的一刻」毋寧是臺灣現代派對寫作最精緻的追求，見夏濟安：〈評〈落月〉兼論現代小說〉，《夏濟安選集》，頁 34-63；葉維廉：〈現代中國小說的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的風貌》，頁 19-50。

既然畫家有了這夢土的想望，在表現上就無法恪守「寫實」手法。「新霽」中已經躍動的圖案化的表現主義，將成為畫家今後創作的主線之一……「南街殷賑」（一九三〇）中更假借照像擬似法預示了後現代的嘉年華精神，把人間世提昇到繁華再把繁華提昇而永駐在節日的歡欣鼓舞裡。¹¹⁴

換句話說，儘管革命日遠，激情的抗爭所遺留的僅僅是綿綿無絕期的憂鬱時光，不過改變世界的衝動，航向烏托邦的憧憬，卻未嘗消逝殞沒——前者化身為文體的鍛造，後者蛻變成意象的錘鍊——都仍然在郭松棻往返此岸彼岸的航道上，引領著他摸索前進。¹¹⁵整體而言，基於對非現實、夢想或者夢境的情有獨鍾，郭松棻勢必難以滿足於現實主義的革命議程；而郭松棻在語言形式的創新上所寄託的人的感官與認知的革新潛能，所謂「一個標點符號放對了位置，就會令人不寒而慄」，¹¹⁶促使他其實與現代派中的前衛（avant-garde）狂飆更為親近。在這個意義上，郭松棻文業中的重複律動，其最深遠意義之一當是為此間的文學偏離出一個嶄新的，得以容納，甚或激盪激進異議的文學時空。¹¹⁷

三、結語：一個創作的起點

本文回顧七〇年代中葉後郭松棻幾個重要的「重返」現象，嘗試對郭氏文業中的重複機制與偏離律動，它背後的歷史語境與心理動機，提出兼具作家作品脈絡的深度，以及文學史與地緣政治變化廣度的多元闡釋。首先，以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說，不難發現，困擾著郭松棻的始終是中國有沒有可能實現革命的問題。

¹¹⁴ 郭松棻：〈一個創作的起點〉，頁 89。

¹¹⁵ 郭氏現代主義文體與其早年政治信仰的關聯，可參考王德威：〈冷酷異境裡的火種〉，收入郭松棻：《奔跑的母親》，頁 3-9。

¹¹⁶ 郭松棻：〈論寫作〉，《郭松棻集》（臺北：前衛，1993 年），頁 397。

¹¹⁷ 張誦聖在出版於 1993 年的專書中認為，臺灣現代派一直缺少在政治上極端反叛的真正前衛主義聲音；相對地，現代派始終和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處於協商斡旋，乃至於補充替代的另類（alternative）關係。站在歷史的後見之明（郭松棻第一部作品集一直要到 1993 年，也就是張書出版該年，才發行問世），我們或可略微調整張誦聖的看法：郭松棻凌厲骨感的現代主義實踐為臺灣現代派開闢了一道真正的前衛聲音。Sung-Sheng Yvonne Cha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0-53, 60.

此一疑難的背後牽扯的無非是左翼與民族主義的糾葛，左翼革命追求一體適用的普遍改革，民族主義固守的卻是國家疆界的畛域界限；而臺灣人處境的曖昧更進一步複雜化郭松棻的命題，甚或暴露了他的推想的徒勞無效。也因此，左翼的憂鬱終歸也是臺灣的憂鬱。奠定於此一認知，郭松棻在八〇年代重返文學寫作。

以下我們將稍微觸及郭松棻小說的討論。識者或要質疑此處加入小說的文本分析是否有些突兀，然而本文的原意本就涵括對於郭松棻文藝觀念演變的考察。在這個意義上，奠定於前文圍繞七、八〇年代郭松棻政治／思想轉折的詳細闡釋，以及有關其人設想「何為文學」又「文學何為」角度轉變的周延解析，文末以郭氏重返文壇時發表的幾則短篇故事為例，示例這些變化在小說寫作上的實際影響，應屬合理的推導。

無論如何，回到文學創作本身，1983年6月到8月間，郭松棻，同樣以羅安達為筆名，陸續在《文季》上發表了若干短篇，以此重新開啟其人的寫作歷程。這批作品包括〈含羞草〉和〈論寫作〉的初稿，在這兩篇名作的光芒下，另外幾則短篇，譬如〈成名〉、〈姑媽〉以及〈第一課〉較少受到注意。¹¹⁸然而透過本文分析的透視，將會發現這三篇文章其實內含值得深入推敲的重要性。

〈成名〉的主角是一個受到妹妹吹捧，幻想自己凱旋歸國會受鄉民竭誠歡迎的留美博士詩人，不過當他以留著長髮的雅痞形象回到故鄉時，迎接他的卻是上前盤查的員警；〈第一課〉講述一名甫在紐約一所知名大學取得兼課機會的年輕女老師的經歷，她對教職充滿熱忱，但不旋踵即被其他同為東亞研究專家的教員，其人的醜態淫行驚嚇恐嚇：這兩篇作品譏嘲開滿，應當是郭保鈞時期雜文風格的延續。至於〈姑媽〉，它以海外的「我」為主人翁，述說「我」在文革時返鄉（中國）省親所遭遇的一連串荒謬劇；在這個意義上，〈姑媽〉明顯是接近李渝〈江行初雪〉（1983）與劉大任〈杜鵑啼血〉（1984）式的傷痕文學故事，允為郭松棻中國旅行經驗的衍生續作。¹¹⁹無論如何，相較於〈含羞草〉與〈論寫作〉等篇展現典型的郭松棻詩意風格，〈成名〉等三個短篇毋寧屬於「社會寫實」。

換句話說，儘管在藝術手法上，〈成名〉、〈姑媽〉與〈第一課〉在郭松棻作品中並不特別凸出，內涵也不怎麼富於沉思，但是此三作彷彿更適宜於我們觀

¹¹⁸ 郭松棻：〈成名〉、〈姑媽〉、〈第一課〉，《郭松棻集》，頁245-247、249-255、257-266。

¹¹⁹ 李渝：〈江行初雪〉，《夏日跼蹐》（臺北：麥田，2002年），頁127-150；劉大任：〈杜鵑啼血〉，《杜鵑啼血》，頁165-216。

察，郭松棻究竟如何從政治行動轉向文學創作的遞嬗軌跡。首先，〈成名〉、〈姑媽〉以及〈第一課〉在《郭松棻集》中與〈秋雨〉編為一輯。在風格上，四篇作品確實比較接近，均流露某種魯迅式的批判，甚至犬儒口吻。不過再進一步細究的話，〈秋雨〉的主題是告別乃師殷海光，郭松棻藉此揮別殷師的自由主義，轉而實踐存在主義的行動原則；在這個意義上，〈秋雨〉無非是一篇郭松棻在六、七〇年代由文學轉向政治的宣言。¹²⁰與此相對地，不論〈成名〉與〈第一課〉中意欲為鄉土／社會奉獻所學的文青男女，又或者〈姑媽〉那位歸（中）國探視宗親故土的海外知識人，他（她）們顯示的在在是個人與現實格格不入的疏離陌生。明顯地，郭松棻需要為他的人物，以及他自己，闢造新的出路，亦即回到文學。如此一來，〈成名〉三作不啻宣告七、八〇年代郭松棻從政治轉回文學的決心。

另一方面，雖然從主題上不難看出〈成名〉三作與七〇年代郭松棻意識形態的扣連——特別是〈姑媽〉彰顯郭對中國革命的失落感，〈第一課〉則帶有頗為鮮明的反帝反殖意象（以大都會紐約的漢學家為標靶）——然而郭敘寫的重點與其說是人物典型性的打造，或者事件因果脈絡的廓清，等等社會寫實高高舉起的創作要旨；不如說郭愈加在意個體在某剎那瞬間突如其來的領會頓悟：〈成名〉以「警察的另一隻手拿著一把亮晃晃的大剪刀」來戳破幻夢中人的白日臆想；¹²¹〈姑媽〉結束在「收回頭，重新拉上車窗以前，我看到多姿的故鄉正浸在灰灰細雨中」的抒情意象，試著基於此來超越中國革命的苦難；¹²²〈第一課〉則是藉由教授們諸般光怪陸離的戀物癖（中國麵條、文革郵票，以及中國女人，紛紛充塞其人扭曲的慾望），給予正直的女教師迎頭一擊。而自我在剎那瞬間靈光一閃的頓悟（epiphany），無非是現代主義最精粹的追求。這項特徵郭松棻也知之甚詳，早在〈談談臺灣的文學〉他就觸及此一現代主義的精髓：

現代主義從個人出發，強調個人站在歷史潮流之外的孤寂形象……個人的感受被放大，現實歷史被縮小……表現手法上，現代主義崇尚個人意識流片面活動的捕捉，屏棄歷史、社會大動態的刻畫，講究點滴、瞬間的特殊

¹²⁰ 〈秋雨〉的謝本師意涵可參考鍾秩維：〈殷師的池塘：郭松棻的〈秋雨〉及其七〇年代的政治與思想轉折〉，頁 739-776。

¹²¹ 郭松棻：〈成名〉，《郭松棻集》，頁 246。

¹²² 郭松棻：〈姑媽〉，《郭松棻集》，頁 255。

經驗的攝取，而無視於連貫性的、整體現實的掌握。現在派常自喻這種觀察世界的手法是，以片段看整體，以剎那悟永恆，從一粒沙看全世界。¹²³

對現代主義具備的清晰洞悉固然淵源於郭松棻在五、六〇年代臺大文學院所習得的知識：現代派文論的架構者夏濟安（1916-1965）是郭的老師，葉維廉（1937-）乃他的學長，更遑論其人恰巧也在《現代文學》創辦的現場。雖然在七〇年代，郭松棻戮力拒斥一己文學基因中的現代派慣習（*habitus*），然而經歷一番周折後的八〇年代，他重新駛入早年揚言背棄的文學航道。經由本文的分析，我們當理解這道重複的軌跡實交錯著千瘡百孔的現實政治創傷，乃至百轉千迴的攸關左，也牽涉統的理論反思亦蟄伏深層。從郭的範例來看，重回創作的起點，重新接合臺灣現代派的木樁，這般實踐絕非重提冷戰自由人文言說的八股；郭松棻對革命為何，而文學何為的省思共同將他的重複朝向新的局面偏離：郭松棻正演繹一己的「文學革命」，此興許是他重返臺灣／文學的真實真諦。沿著這條道路往前走，八〇年代的郭松棻將接連用〈月印〉、〈雪盲〉與〈今夜星光燦爛〉（1997）等作品，為此間開闢一個又一個介於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臺灣意象，一幅又一幅輻輳於人間煙火與非人間幻夢之間的如畫風景。我們或許可以將郭松棻寫在〈一個創作的起點〉最後的幾句話加以改寫，用他總括父親藝術的語言來概括其人文學的重複與偏離律動：

從八〇年代開始，不滿於寫實而隨時要超離現實的這種表現方法，早已成為作家的創作主線之一。往後二十多年的作品裡，這條線索時隱時現。無論是風景或花卉，無論是鄉情或域外，歷史或風土，在多側面的想像世界裡，都能看到那個手法在支使著小說的完成。¹²⁴

重複的律動在非人間性的想像牽引下逐步偏離同一（*identification*）的常軌，換句

¹²³ 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頁 38-39。

¹²⁴ 郭松棻：〈一個創作的起點〉，頁 89。原文為：「從三〇年代開始，不滿於寫實而隨時要超離現實的這種表現方法，早已成為畫家的創作主線之一。往後半個世紀多的作品裡，這條線索時隱時現。無論是風景或花卉，無論是鄉情或域外，歷史或風土，在多側面的想像世界裡，都能看到那個手法在支使著畫面的完成」。

話說：重複即差異。¹²⁵文學中的民族身份與階級認同遂有望遠離一個蘿蔔一個坑般的制式代現，一種邁向革命新局的美感重新分配正在文藝創作的行動中醞釀發酵。¹²⁶而郭松棻的小說本身究竟如何透過重複與偏離的機制實現革命的換新，則是本文留待未來將接續處理的話題。

最後，晚近郭松棻、李渝的手稿與藏書相繼捐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這一批材料對於未來研究者更全面理解郭、李其人其作，乃至於探索他（她）們的時代必定深有助益。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仍專注既有材料的鑽研難道不是墨守成規？一方面，我們大抵不會反對，設若缺少基本的史實輪廓與概念骨架，像是未完成的手稿，抑或雪泥鴻爪的書頁註記，這一類材料的意義終究難以顯現。亦即新材料在研究上的效用基本上奠定於補遺，縱使它確實擁有足以推翻前行框架的巨大潛力，其前提還是必需有一個足夠堅實的框架與之對抗。另一方面，現階段或許我們也還不宜過份誇大郭、李手稿和藏書的顛覆性。事實上，根據楊婕對一篇郭松棻手稿中相對完整的小說〈冰蠶〉的分析，她發現此一作品意識型態先行的狀況明顯，說故事的方法也比較單一呆板，應當是郭松棻進入技藝純熟期之前的習作。¹²⁷換句話說，儘管〈冰蠶〉有助於複雜化吾人對郭松棻重返文學歷程的認識，但是它尚未能推翻目前對於郭松棻成熟作品的主要詮釋。甚且單就郭氏如何克服意識型態偏誤的精神史演變而言，似乎也非一定要靠新出土的〈冰蠶〉才能闡釋；相對地，本文所處理的非小說材料，至少在這個議題上，恐怕更能揭露這一話題的多元面向。無論如何，本文期待能成為未來郭松棻、李渝手稿與藏書研究有效的一個測試介面（sounding board）。

¹²⁵ 可參考潘怡帆：〈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頁 29-46。

¹²⁶ 借用當代法國哲學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 1940-）的話。見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著，楊成瀚，關秀惠，戴遠雄譯：《感性配享：美學與政治》（臺北：商周，2021 年），頁 25-38。

¹²⁷ 楊婕：〈隱蔽的七〇年代：郭松棻後期作品中的「保釣敘事」〉，《臺灣文學學報》第 41 期（2022 年 12 月），頁 63-96。

徵引書目

〔近人論著〕

-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9年。
-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9年。
-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新北：聯經，2021年。
- 王德威：〈冷酷異境裡的火種〉，收入郭松棻：《奔跑的母親》，臺北：麥田，2002年。
- ：〈海派作家，又見傳人：王安憶論〉，收入《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2002年。
- ：〈最後的馬克思：論陳映真〉，收入《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臺北：麥田，2007年。
- 李怡訪談、整理：〈長期鑽研理論的郭松棻〉，《知識份子與中國》，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83年。
- ：《失敗者回憶錄（上卷）》，臺北：印刻，2023年。
- 李渝：〈江行初雪〉，《夏日跼蹐》，臺北：麥田，2002年。
- ：〈抒情時刻〉，《行動中的藝術家：美術文集》，臺北：藝術家，2009年。
- ：〈射雕回看〉，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2014年。
- 著，梅家玲、楊富閔、鍾秩維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吳叡人：〈重層土著化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3期，2009年9月，頁133-163。
- 柳書琴：〈導言：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臺灣「地方文化」〉，收入吳密察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2008年。
- 施淑：〈臺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藝術〉，《兩岸文學論集（一）：文學星圖》，臺北：人間，2012年。

張系國：《昨日之怒》，臺北：洪範，2002年。

張政傑：〈東亞「風雷」如何殘響？臺灣「保釣文學」與日本「全共鬥文學」的比較研究〉，《中外文學》第48卷第2期，2019年6月，頁85-130。

張俐璇：〈雙面「一九八三」：試論陳映真與郭松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5期，2017年10月，頁219-249。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張隆志編：《島史的求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

陳芳明：〈葉石濤臺灣文學史觀之建構〉，收入《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2002年。

陳映真：〈前言二：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收入釣運統運文獻編委會編：《春雷之後（壹）：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臺北：人間，2006年。

陳培豐：《想像與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2013年。

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收入《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2004年。

——：〈窗、框與他方：論郭松棻的域外寫作〉，收入《論嘗試文》，臺北：麥田，2016年。

郭松棻：〈喜劇·彼岸·知性：談木心的散文〉，《中報·副刊》，1986年6月20日。

——：〈一個創作的起點〉，《當代》第42期，1989年10月，頁84-89。

——：《郭松棻集》，臺北：前衛，1993年。

——：《奔跑的母親》，臺北：麥田，2002年。

——著，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哲學卷》，新北：印刻，2014年。

——：〈談談臺灣的文學〉，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9年。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9年。

葉維廉：〈現代中國小說的結構〉，收入《中國現代文學的風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

夏濟安：〈評〈落月〉兼論現代小說〉，收入《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1971

年。

楊婕：〈隱蔽的七〇年代：郭松棻後期作品中的「保釣敘事」〉，《臺灣文學學報》第41期，2022年12月，頁63-96。

楊凱麟：〈寫作寫作的寫作：論郭松棻的「時間—文字」〉，《中山人文學報》第50期，2021年1月，頁31-54。

潘怡帆：〈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中山人文學報》第42期，2017年1月，頁29-46；

——：〈缺席及錯置的作品：從郭松棻的〈寫作〉到〈論寫作〉〉，《政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18年12月，頁249-279。

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誰為何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第23期，2005年7月，頁36-54。

劉大任：《晚晴》，臺北：印刻，2007年。

——：《遠方有風雷》，臺北：聯合文學，2010年。

劉羿宏：〈論戰、運動、愛荷華：王拓「鄉土觀」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第32期，2021年春季，頁103-130。

劉淑貞：〈論寫作，以及它的匱缺：論郭松棻的小說〉，《中山人文學報》第44期，2018年1月，頁33-54。

——：〈鬱的演化：從藝術批評到小說書寫——論李渝保釣後的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第37期，2020年6月，頁127-150。

鍾秩維：〈殷師的池塘：郭松棻的〈秋雨〉及其七〇年代的政治與思想轉折〉，《清華學報》第52卷第4期，2022年12月，頁739-776。

魏偉莉：〈創傷與重生：從早期作品論郭松棻創作基調的形成〉，《臺灣文學研究》第1期，2007年4月，頁33-71。

簡義明訪問、整理：〈郭松棻訪談錄〉，收入郭松棻著：《驚婚》，新北：印刻，2012年。

——：〈冷戰時期臺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臺灣的文學〉為線索〉，《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2014年4月，頁207-240。

顧正萍：《從介入境遇到自我解放：郭松棻再探》，臺北：秀威，2012年。

鐵曇（郭松棻）：〈阿Q與革命〉，《盤古》第36期，1971年1月，頁32-33。

松永正義著，李尚霖譯：〈關於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彭瑞金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5）：葉石濤》，臺南：國立臺灣文

學館，2011 年。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斐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麥田編輯室譯，林宗弘審訂：《共產黨宣言》，臺北：麥田，2014 年。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宋文里譯：〈憂鬱與哀悼〉，收入《魔鬼學：從無意識到憂鬱、自戀、死本能》，臺北：心靈工坊，2022 年。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著，楊成瀚、關秀惠、戴遠雄譯：《感性配享：美學與政治》，臺北：商周，2021 年。

雷克斯·韋德（Rex A. Wade）著，謝家柔譯：《共產元年 1917：俄國革命與改寫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新北：遠足，2021 年。

聖地牙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著，羅安達（郭松棻）譯：〈第一章：國家對社會〉，《抖擻》第 29 期，1978 年 9 月，頁 20-28。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en, Po-hsi. "Socialism on One Island: A Genealogy of the Pro-Unification Literary Discourse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Yale University. 2020.

Chang, Sung-Sheng Yvonne.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ud, Sigmund. "Fetishism," in James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1*. London: Hogarth Press, 1995.

Hang, Tu. "Left Melancholy: Chen Yingzhen, Wang Anyi, and the Desire for Utopia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3, no.1 (Spring 2021): 122-160.

Larsen, Patrick. "Santiago Carrillo (1915-2012): The Man Who Betrayed Two Socialist Revolutions," *In Search of Marxism*, 26, Sep., 2012, (source: <https://www.marxist.com/santiago-carrillo-1915-2012-the-man-who-betrayed-two-socialist-revolutions.htm>, 2023.2.9).

McNeal, Robert H.. "Demonology: The Orthodox Communist Image of Trotsky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Winter, 1976/ 1977, vol. 32, no. 1, *Communism* (Winter, 1976/ 1977): 20-40.

- McMeekin, Sea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New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 Medvedev, Zhores A.. *The Rise and Fall of T.D. Lysenko*, trans. I. Michael Lerner.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 Ranadive, B. T.. "Carrillo's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Social Scientist*, vol. 7, no. 3 (Oct., 1978): 3-35.
- Shih, Shu-mei. "Is the Post- in Postsocialism the Post- in Posthumanism?" *Social Text*, vol.30, no.1 (Spring 2012): 27-50.
- Traverso, Enzo. *Left-Wing Melancholia: Marxism,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 Xiao, Chi. *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 Zhang, Dora. *Strange Likeness: Description and the Modernist Nov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Repetition and Deviation: On Kuo Song-fen's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1970s-1980s

Chung, Chih-Wei*

[Abstract]

Kuo Song-fen play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oles within Taiwan's Modernist trend; he also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overseas Baodiao movement. For the decade of 1970s, Kuo Song-fen has unveiled numerous essays and articles on the politics, Marxism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Kuo's engaging in and withdrawing from Baodiao movement that accompanies with his dedication to these writings. However, inasmuch as Kuo has been oscillating between revolutionary utopia and post-revolutionary dystopia for this decade, it is no wonder that Kuo's investigations into and interpretations about a same topic or character, the former opinions and the latter ones usually do not coincide with each other. That is what the title of this paper entrenches: repetition and deviation. For inquiring into Kuo's hiatus, this paper departs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eft-wing melancholia" so as to contextualize Kuo's works on political thoughts (his takes in context of global leftism in particular) on the one hand, and conceptualize the unfolding of his literary criticisms (especially of those on Taiwan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Overall, we expect not only to illuminate the multilayers engendered by Kuo's vicissitudes of (literary) life, but also to demonstrate "the politics" entailed by the Modernist aesthetics.

Keywords: Kuo Song-fen, Post-Baodiao, Left-wing Melancholia, Melancholia of Taiwan, the Modernist, the Nativist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